

# 鐘聲

ZHONG SHENG



秋怡

# 我们校友会的网站

我们校友会的网站：《北美位育人》于去年秋天开通了。感谢周家钧的辛勤耕耘，在网站建设中展现她的专业和天赋，把网站办得生动精彩。

在我们的网站中：“位育人动态”及时登出各种联谊活动和来自母校的信息。“位育人影集”汇集了历年校友活动集锦。“位育人天地”是个热闹的分亨园地，在这里校友们分享随笔，幻灯集锦，知识小窗口，影视达人等等。暂时在位育人天地里的“尊师篇”，不久将独立开篇，刊登丰富的尊师文章和影集等。“钟声下载”汇集了历年的钟声年刊，从中可以看到北美校友会的成长历程。校友会之外的首次浏览者，尤其喜欢这页。

如今，通过任何网络搜索引擎，都能搜索到《北美位育人》，由此吸引了不少朋友来到我们的网站。《北美位育人》不仅为北美的校友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也为世界各地的位育人的联络互动筑起桥梁。欢迎大家随时访问《北美位育人》，在这片被母校的丰富营养所滋润的园地中畅游、回忆和休憩。也盼望更多的位育人能提供与同窗重逢欢聚的照片；自己创作的文笔、美术、摄影、幻灯片等各种作品；在网站上与大家分享。《北美位育人》将竭力设计调整版面，减少篇幅限制，及时快捷地登载大家的来稿。同时希望大家经常与网站联络，告知任何意见、想法和建议，为校友会 and 网站的成长发展贡献位育人的才智和能量。



不到半年，已有22万人次点击我们的网站，正式访问的人次也已超过3千！

[www.weiyu51na.com](http://www.weiyu51na.com)



## 本期要目

王家斌	密西西比河的源头	周家钧	乌龟和我	吉力立	钟声纪事
瞿德霖	明州的欢聚经验	周国辉	十年寒窗播良种	萧亦麟	高尔夫
孙雯	沐浴在位育的阳光下	吉力立	词五首	俞沐民	老覃走了
宓哲新	旧雨新知，都是位育人	陈怀志	蒋衍老师二三事	陆纘聪等	关于钟声的建议
王家斌	秀野桥	张人德	上学的路		
姚方方	难忘的五十一中学排球	周国权	回溯		
队		蒋雄一	悼念父亲	财务报表	
矫桂瑾	自强不息	叶秋怡	煤球炉	校友通讯录	

## 编者按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

《钟声》编辑的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我们的校友会是联谊组织，《钟声》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尤其是回忆我们在母校时光的园地。

从上一期开始，《钟声》已经采取全部彩印出版，这期开始，在内容编排方面更有特出的新意，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多添加丰富色彩。在这个网络信息应有尽有的时代，需要大家一起来将《钟声》编成一份我们自己的独特且有保留价值的刊物。

在此特地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北美校友会的网站：《北美位育人》家园，在周家钧校友的辛勤耕耘下，正茁壮成长，成为中国海外校友会网站的典范，和我们的《钟声》一样，为其他各大中学校友会羡慕不已，所以请各位校友常回家看看：[www.weiyu51na.com](http://www.weiyu51na.com)。同时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可在《北美位育人》网站上浏览或下载。

我们《钟声》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有个故事。同时，欢迎各位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职场上尽心尽力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见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都请踊跃投稿。

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编辑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但和文章的观点无关，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盼望没有为本刊动过笔的校友和老师来稿。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都欢迎。请注意，文字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没有特定格式的中文或英文电子文件方式 Email给我们。相信大家能谅解编辑部人员都是义务贡献时间精力，尽量避免手稿和打印稿，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在此我们更要感谢赵雯雨，华非非，叶秋怡等为本期《钟声》打字，他们的辛苦，使多篇手稿得以在本期发表。

谢谢大家的努力和支持，欢迎大家传阅《钟声》，欢迎访问《北美位育人》，更欢迎和盼望新会员的加入。

来稿请寄北美位育校友会的下列服务组任何一位成员：

叶秋怡 [qiuyi.ye@gmail.com](mailto:qiuyi.ye@gmail.com)， 吴攸承 [nickwu@aol.com](mailto:nickwu@aol.com)， 周家钧 [jovitachow@yahoo.com](mailto:jovitachow@yahoo.com)，  
 蒋青 [qingjiang@hotmail.com](mailto:qingjiang@hotmail.com)， 王家斌 [jjabin.wang@utoronto.ca](mailto:jjabin.wang@utoronto.ca)， 叶善章 [sarahye@yahoo.com](mailto:sarahye@yahoo.com)，  
 华非非 [huaff9@gmail.com](mailto:huaff9@gmail.com)， 孙雯 [sun07059@yahoo.com](mailto:sun07059@yahoo.com)， 朱凯靖 [george.chu@oracle.com](mailto:george.chu@oracle.com)，  
 瞿德霖 [delinqu@gmail.com](mailto:delinqu@gmail.com)

# 密西西比河的源头

王家斌 65 届

唸中学时我曾经很喜欢看马克·吐温的书。先是看他最著名的两本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后来又找来了《在密西西比河上》、《赤道环游记》等非小说类的作品来看。高中时朱启新老师用简写本的“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做课外教材，语文课本里收了短篇小说《竞选州长》，这些都让我接触了更多的马克·吐温的作品。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由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电影《百万英镑》也是根据马克·吐温的小说改编的。

马克·吐温原名Samuel L. Clemens，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1835年他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市，四岁时随家人迁居到密苏里州的港口城市汉尼拔（Hannibal）。他年轻时当过印刷工人，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水手、领航员，对这条河十分熟悉。他在他的作品里用幽默的笔触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一带的水手、农夫、牧师、骗子、江湖艺人。在他笔下，密西西比河是一条让人捉摸不透的河。有时它静静地流淌，波澜不惊；晚上坐在河边，可以听到很远处传来的农庄里的狗叫声。洪水来的时候，河面可以扩张到有几英里宽，河水湍急，河上漂着树干、木排和破船，使得驾船变得十分危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的哈克贝利离开家乡后，乘着木排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或者在河中的小岛上露营、打猎和钓鱼。我自小生活在长大，平时很少接触大自然，最了不起的就

是小学时走到龙华镇外的小河边抓小鱼、蝌蚪和看火车。逢到春游、秋游，前一天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干粮、弹弓、小刀和指南针，其实至多是在公园里划船或者玩官兵抓强盗。对于哈克贝利那样的野外生活和历险真是眼热。在我这个少年人的心里，密西西比河是一条遥远而又有点神秘的河。

2011年校友会在明尼阿波利斯聚会，感谢瞿德霖校友的安排，行程之一是去州立公园Itasca State Park。当我知道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就在那个公园里，心中沉睡了几十年的少年时的梦想一下子苏醒过来了，盼望着能早点见到那条曾经在我心中奔腾而过的大河。

密西西比河汇集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流域里的水，其水源最远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境内的渥太华河谷，但是正式认定的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就是这个州立公园里的Lake Itasca。9月17日那天我们参加聚会的校友乘车四小时，来到了Lake Itasca。湖的周围地形平坦，尽是很密的树林，郁郁葱葱，望不见尽头。湖水清澈，可见底；湖面不大，放眼望去，跟上海长风公园的银锄湖相近，但因为湖面形状不规则，实际的湖面要更大些。湖边立一粗大圆木，可能就是原来生长在那儿的大树，就地取材，不作雕琢，只是将一半削平而刻了几行字，大意是此处高出海平面1,475英尺，密西西比河由此奔流2,552英里而注入墨西哥湾。就这碑，就这句话，已经透出一种古朴、粗旷的气势。圆木右侧有一小溪，宽不过十米。湖水翻过一条碎石块垒成的小堤坝流入小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密西西比河了！我忽然童心萌动，脱了一只脚的鞋袜，把脚浸入水中，接受了冰冷的密西西比河水的洗礼。



# 明州的欢聚经验

瞿德霖 66 届



我们位育的每一次团聚都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正如我们位育网站所言：“这里有当年的稚气和聪慧，也有如今的成熟和热情。位育人不为岁月的流失而感叹，却为气质的永存而自豪。”

明州的欢聚亦不例外，俗言没有不散的筵席，团聚后，我仔细回想一下，今后的团聚可以从我们这次2011年明州的团聚中得到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长达近六个月的组织联系，网上的邮件有几百个来往，我在最后一个月用了三个邮件系列，“FINAL, FINAL, FINAL”，然后是“FINAL”，然后是“FINAL, FINAL”，希望能省时间和保持效率，但还是每天都有各方来邮，横插竖立，大家每天要迷失好几次，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清楚每位参与者的意思。今后可以通过位育网站进行组织，有专人整理各方意见和反馈，每确定一个议题，就重新开始另一个邮件系列，比如确定时间，机场接送，团聚餐饮，等等。

团聚的安全舒适最重要。参与者年龄不一，身体状况不一，所以要从最高年龄和最弱体质的情况考虑。交通，饮食，住宿，时间，携带衣物等都要顾到。我们这次的交通选择大型旅游车，带司机和厕所，效果很好。没有人晕车，聊天的聊天，叙旧的叙旧，瞌睡的瞌睡，吃喝的吃喝，所以一到目的地，每个人都精神焕发，兴致勃勃。如

果这么多人像我们最初计划的那样挤在多辆小车里，还要顾虑失散等问题，效果将大减。在此要向位育校友会的赞助致谢。

一个成功的团聚和协作的精神分不开。我们位育人为气质的永存而自豪，人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大家互相体谅互相沟通，就保证了团聚的成功。每个参与者远道而来，所以欢愉是目的。价值观不同，年龄不同等都需要每人有宽容，幽默，和随意的本能，团聚如此，生活也如此。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开玩笑，无论是种族信仰习惯等，任何事任何人都要开玩笑，1976年毛过世时的单位仪式上，我因为在最后一排开玩笑搞得几个人笑个不停，差点抓进去。这次团聚的每个参与者都带有极大的幽默感，大家相逢一笑值千金，应该是笑得很开心。

多亏我们明州老土地雪薇熊路夫妇和新搬迁户立力嘉陵夫妇的鼎力协作，为策划团聚的日程到为大家的食宿安排机场接送等都立下汗马功劳。这就是我们位育团结协作精神的传统。这亦是经验之一，同学团聚地方的组织援助人员一定要像我们这次一样的精练高效，同时账目清晰。惠民自告奋勇地担任财务，在旅游车上偷闲将账目一一搞定。

我们通过孙雯学妹，发掘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清清，是位年龄才20来岁的小校友，我猜想清清那几天一定被各

位级别年资高的校友“教育”和“忆苦思甜”得头晕。

另有一点供参考，就是团聚拍照的紧凑问题。本次团聚，从幕后到前台，攸承学弟永远劳苦功高，从近千张的高清晰照片，到帮助需要接送和身体不适的校友，从任劳任怨地烧烤勤务，到团聚后的影像制作，真是难为他的多才多艺了。我当时请攸承学弟来担任“官方摄影服务员”的目的是顾虑到一大帮人聚集一起照相不容易，所以会有每个自带相机摄影机的校友要照，有可能拖延时间，劳累带笑的脸。我想不如一个人出来多拍几张，团聚后分享是肯定的。

现在想想，每个人还是喜欢自己留的影，目前的方式是大家将留影送到攸承学弟处，再综合编辑一张硬盘，这样我们欣赏到每个人的摄影艺术，是一件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乐趣。尤其是家斌哲新夫妇秋怡学姐等参观明州艺术馆的摄影和师尧马兰夫妇另外安排若干游览点的纪念，为我们的团聚增添特殊的光彩。

民主基础上的一致可以节省时间。这次团聚的餐饮，尤其是两次午餐都是以明州特产为主，一次是以野稻米奶酪汤和野稻米煨饭为主，一次是雪薇夫妇慷慨款待大家的以野稻米奶酪汤和煎大眼狮鲈鱼排为主（英文名为Walleye，其肉质鲜美，在北美，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是重要的湖水鱼，在明州，很多餐馆都以此为特色菜招徕客

人。）大家品尝的是我们明州真正的地方佳肴，当然也有可能朋友不一定喜欢，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和谐。如果每餐都各人自点，会花费很多时间结束一次午餐。

人散曲不终，我们享受了团聚的欢乐，认识了新朋友，重温了旧情谊，尤其是增进了互相的了解。娘子军团薛老师王怡和秋怡善章学姐孙雯学妹，住在我家，没有增添一点点麻烦，就和当年红军八路军号称他们给老百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样，无论是烧烤前后，还是她们走后，我一点都不用清洁整理，她们全包，帮忙帮到底了，留下的尽是难以忘怀的笑声。

学姐家钧和我是通过对海军父辈共同的追念而在网上来往，第一次在机场见面，我们代表父辈互敬军礼。蒋青学兄的母亲和我父亲是中学同学，我们一直要见个面，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在力立嘉陵的新家第一次欣赏到他的表演，太妙了。学妹许建克服最初的水土不服，后来居上，希望她也玩得高兴。璧华陈榴结伴光临，我都没有来得及请璧华在我一直珍藏的文乔学兄的纪念文集上签个字，当年我是怀着崇敬文乔在病重时还顾及钟声出版的精神，应文乔之托介入钟声的工作。

送最后一批校友家钧夫妇离开明州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在回家的路上，就感到有点情绪低落，人生何其短暂，各位还会来明州吗？



陆致极 65 届

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份研究手记。它的主题是：**出生时间与体质之间的相关性**。在现代人看来，个人的出生时间跟他的体质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通过 100 多个案例的体质测试、以及相对应的出生时空的计量分析，**作者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

本书记录了整个探索的过程。虽然，限于作者现有的条件，收集到的案例还不多，但其结果却令人鼓舞。它凸显了中国古代“天人一体”的自然观的深邃意义。这是中华文化源头的一泓清泉！这种东方的对自然和生命现象的独特认识，并不仅仅是哲学的思考，它有具体的描写方式，并已渗透到包括中医学在内的许多传统的知识体系之内，**在今天仍应具有实践的意义**。

作者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分析个体出生时的时空结构信息下手，去探索自然大环境所给予每一个个体的

特殊的印记。这个印记，作者把它看作是个体先天禀赋的一个因素，故称之为“时空基因”。它是中国古代先哲们观察到的、区别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基因的另一种基因。

在解读案例的时空基因的过程中，作者得到了 8 种体质 11 小类的先天体质倾向基本式。这种对先天体质倾向的探求，若能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则将丰富和深化 20 世纪 7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关注个体特异性、强调个性化诊疗的中医体质学理论，为当今方兴未艾的中医“治未病”的广泛社会实践做出贡献。

本书还尝试将这个探索向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是个体体质倾向的预测；另一个是从出生时空到先天体质、进而到疾病的研究。作者为此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工作。

## 新书介绍



# 沐浴在位育的阳光下

孙雯 81 届

2008或2009的感恩节，吴攸承（Nick）为钟声约稿给我打过电话，电话打得蛮长聊得很开心。电话之后的第二天，Nick就把他新买车子的发票Fax给我了，因为我电话里讲起想买Nick新买的那款车子。Nick寄来的发票有他车子的型号还有他家里的地址和信用卡号码，过后Nick还打电话来仔细关照如何跟Dealer还价。倒是也说起过我们住得不远应该碰一下面，可是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之后Nick订阅了我的博客，过一阵他就会电邮过来为我的新博客喝一声彩，人却常常出差在万里之外的中国。

因为四月份母亲的事情，我想到了做律师的校友瞿德霖，很唐突很冒昧地打电话向他请教法律问题。瞿德霖一口应承，特地花了时间去向国内的律师打听和咨询，这样一来一去，我们也是打了几个电话通了几个电邮。当时瞿德霖正在中国出差，而且过后读瞿德霖博客时才了解到其时他岳父大人在北京刚刚过世。借此机会向瞿德霖老阿哥郑重致谢。

看到叶善章Sarah学姐转发的蒋衍先生儿子蒋雄一在追悼会上的吊唁稿，我随即寄电邮请她向蒋先生家人转告慰问。四月在上海时，已经听说蒋先生身体欠佳，但是这么快还是很震惊。Sarah因为担心我思念母亲过度伤心，时常

跟我聊天开导我。有天她问我会不会也去明州聚会时我有点讶异，因为我还处在小孩小工作忙的创业阶段，一般校友会之类的活动对我都是相对比较奢侈的。然而被Sarah这么一问，我倒是认真地想了一下Why Not。

做东邀请的瞿德霖在电话里听声音虽然严肃但是沉稳热心，听Sarah讲去明州聚会的还有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Nick，薛兰芬先生的女儿王忆也会带她妈妈一起去，薛先生以前和我妈妈是一个教研组的，王忆跟薛先生，我爸爸妈妈，和潘承芬先生家的“高老太爷”高医生，还有殷蔚芷先生，是八十年代一起爬黄山的搭档。由此算来，明州聚会我还是有认得的人的。外加我的表外甥戎子弘小名“清清”，正好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读金融数学的硕士，他也是我们位育中学毕业的。

于是我把家里的和单位里的事情做了安排，买了去明尼苏达的飞机票。

因为送我去机场之后老公要赶去上班，十六号那天我们大清早就出了门，上了高速才发现我把隔夜充电的手机忘在了家里。拿了老公的手机，因为时差又不敢打到明州，只好打给也是正在去机场路上的Nick，他一口答应帮我和明州联系，同时也会替我照着瞿德霖编排了再编排的“倒计时与会校友通讯录”找到清清。没过几分钟又忽然想起没有带护照，实在是有很久没有乘美国本土的航班了。再打电话给Nick核实，在没有见到Nick之前，就已经三番五次地麻烦他，有点难为情。

飞到明州机场，吴雪薇学姐的先生熊陆大哥举了写着我



名字牌子等在行李线边，吴雪薇大姐则是等在大厅中央的门口，想必他们两个是设计好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呢。雪薇大姐和熊陆大哥在机场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而且据 😊 说他们两个在停机楼之间转了好几圈。因为给清清带了大半箱的零食，我带了一个大号的拉杆箱，熊陆大哥客气得很，亲自帮忙拖我的大箱子。雪薇大姐和蔼可亲，熊陆大哥鞍前马后，接了我之后，我们又一起赶到另外一个停机楼，接到了手挽手走出飞机 newly wed 的王师尧马兰夫妇。与此同时，担任活动总指挥的瞿德霖，一整天都在机场植物园饭店之间周而复始地驱车来回，马不停蹄地分批分量运送校友，同时还不不停地用手机遥控联络各方人马。

等我到瞿德霖太太陈红的天津馆时，店堂里已经是人声鼎沸高朋满座，比我早到的校友们有的游览了明州的植物园有的参观了明州的艺术博物馆。Nick 也已经帮我把清清从学校接了来，安排了坐在我的身边。瞿太太在厨房里统筹兼顾，精心制作了一道又一道的冷盘热炒。瞿太太的核桃大虾香浓美味，小牛肉鲜嫩无比，燕山凉粉堪比凉拌海蜇，瞿太太的饭店名字叫的是天津，上海小菜做的也是绝对正宗灵光，两面黄炒年糕还有用咸蛋黄炒的大龙虾，都是天津馆的绝活。佳肴面前瞿德霖自己却是滴口未沾，穿插在觥筹交错间给校友们斟酒布菜，还要指挥店里的侍应生甚至瞿太太。瞿德霖和瞿太太为了我们这一次的聚会，真是花了大心思砸了大银子。瞿太太的天津馆

www.atianjin.com 在明州，好比是鹿鸣春在纽约，老饭店在上海，狗不理在天津，全聚德在北京。

饭后和清清许建一起搭 Nick 的车去瞿德霖家，瞿家整墙的书架，硕大的写字台，和厨房及地下室好几只“工业尺寸”的超大冰箱令人印象深刻。瞿德霖主随客便放任自流，校友们或站或坐交谈甚欢。叶秋怡大姐找来了茶叶茶壶茶具给大家烧水沏茶，Nick 则挽起袖子亲自腌制起第二天的 BBQ。据说瞿德霖和吴雪薇夫妇为了买到最好的牛肉，特地去 Restaurant Depot 的大型冷库里面寻找，因为冷库里温度低，他们三人只好换了唯一的一件厚外衣轮流钻进去。

薛先生母女，叶秋怡，叶善章，还有我四个女生，各占一间睡房借住瞿宅。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大家都有些兴奋得难以入眠，王忆号称“Sleepless Seattle”，躲到叶善章房间里玩起捉迷藏，夜深人静我们还围在瞿德霖书房间聊天。第二天天不亮，瞿德霖来挨个敲门做 WAKE UP CALL，声音低沉严厉象极了从前往住宿学校里的宿监，把赖床的心思都吓跑了。楼下饭桌上，瞿太太给我们熬好了清香的南瓜粥，备好了干点，还精心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小菜。

载我们去密西西比河源头的大巴士宽敞舒适，随车的简易厕所实用方便，能够随时随地解决燃眉之急。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并不算短，但是校友们情绪高昂，一路笑声不断。王师尧应邀率先介绍了他们夫妇的网恋和闪婚，率性



真实与时俱进；蒋青嘤起呶起来了一段威虎山上杨子荣的“今日痛饮庆功酒”，瞿德霖的“华人按摩女诉讼案”，吉力立的“机遇，政策，北仑港”，给大家带来一阵又一阵的欢笑，熊陆大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专业的男高音震惊四座。

密西西比河源头的公园深处，Itasca Lake湖水潺潺，绕过错落排列的鹅卵石，开始了密西西比的千里奔腾。源头边的牌子上写着，“此处海拔1475英尺，密西西比河由此蜿蜒盘旋2552英里，最后流入墨西哥湾”。美国的母亲河在她的发源地宁静致远，位育的校友们纷纷踏上鹅卵石块，豪迈之情油然而生，“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鱼翔浅底，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Nick的尼康此时响声大作，历史性的镜头尽收其中。

品尝了印第安人野稻米做的色拉饭奶酪汤，回程的车厢里，孙惠民架起老花眼镜跑前跑后算帐收钱，俨然是我们这次活动的“帐房先生”。校友们有打盹歇息的，也有小声聊天的，瞿德霖大哥也好像是此时此地才开始放松微笑了。当日的晚饭是前一天Nick给大家腌制好的美味BBQ，和女生们当场制作的大虾串烤。瞿德霖发动全家，太太在院子里烧烤，妹妹帮忙收拾碗筷，大家有吃有喝有说有笑。饭后受吉力立林嘉陵之邀，大队人马又移师转战到吉家继续联欢，林嘉陵准备了冰淇淋蛋糕等甜点夜宵款待大家。蒋青能者多劳继续说学逗唱，他先模仿杨华生的“无锡人洗上海人死”，拖长声音的“先生”一出来，大家就立马笑得前仰后合，紧跟着又来了一段苏州人无锡人人挤人的笑话；熊陆大哥再展歌喉佳曲不断；女主人林嘉陵台上台下又唱又弹，男主人吉力立也自告奋勇欣然高歌；瞿太太陈红身段婀娜舞姿曼妙；王家斌的口哨猜歌则更是别出心裁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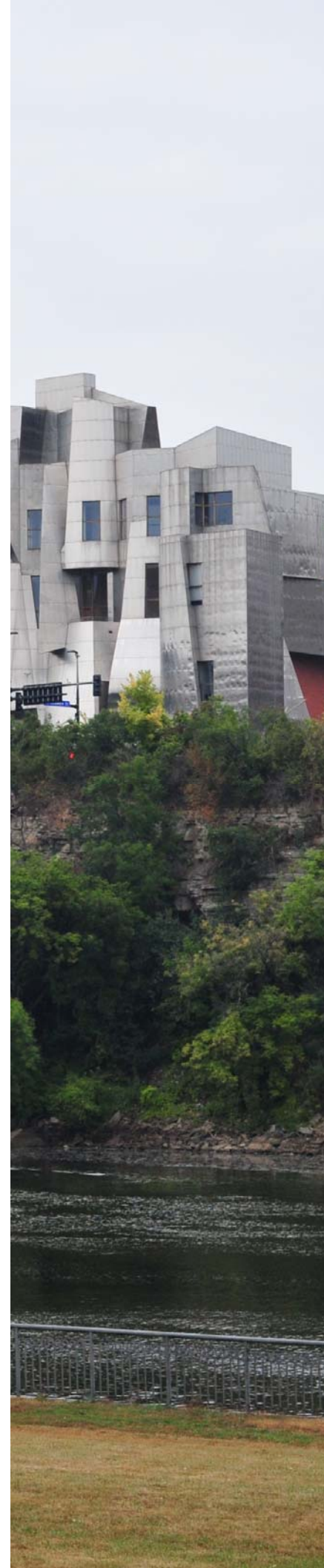
新近迁居明州的吉力立夫妇用刚安置了大半的新居热情招待了蒋青，孙惠民住宿。周家钧夫妇则被吴雪薇夫妇接至家中用

全新的被褥床单毛巾外加美味早餐款待，为了让清清也能全程参加我们的活动，吴雪薇夫妇晚上也把他领回家去，睡好吃好照顾好了又再带回来，听清清讲熊家丰盛的早餐是他到美国来之后头一次吃到的最正宗的中国早餐，熊陆大哥甚至把自己崭新的内衣裤送给清清洗澡替换，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清清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婆，要我代表他们感谢吴雪薇大姐熊陆大哥给予清清的温暖和鼓励。

第三天一早，位育校友分别乘坐瞿德霖，吉力立，吴雪薇，王家斌，Nick的座架，一行车队浩浩荡荡，参观了排名在全美最美大学校园前50名的University of Minnesota，游览了明州州府Saint Paul的地标性建筑和雕塑，在Still Water的Historic Freight House Restaurant，享受了明州特产的无刺河鱼和野稻米浓汤套餐，席间蒋青即兴表演了一段叶宝康老师的模仿秀，惟妙惟肖真是卓别林再世。饭后吴雪薇熊陆夫妇执意为大家买单，虽然最终拗不过他们二人的一片好心大家恭敬不如从命，但是午餐规格不低，加上我们有二三十号人，全部让吴雪薇熊陆承担大家的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的。明州的校友们你们破费了辛苦了，参加这次活动的所有同学再次感谢你们。

雨越下越大，坐在有130年历史的老房子Patio上，我们可以俯瞰美丽的的St. Croix River，河上有古老的铁链吊桥，隔着雨雾我们还能遥望河对岸的威斯康星州。刚刚熟识马上却要分手，离情别绪很快就弥散在校友们之间。

在明州的几天，感受着校友们的团结和友爱，仿佛沐浴在“天地位焉”的阳光下，生活在“万物育焉”的土壤里。从密西西比源头回来时小朋友戎子弘（清清）跟我耳语：“这一车，载满了实现了的美国梦啊！”神闲气定地一路走来，云淡风轻地驻足回顾，“栉风沐雨却不急功近利，成就辉煌也不轻狂张扬”，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引以为荣的“位育”风格。



# 难忘的五十一中学排球队

姚方方 66届



中学同学聚在一起回忆校园生活，常离不开排球这个话题。排球运动可谓当时五十一中学校园文化的一个亮点。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玩排球，无论课前课间还是课后，校园里总聚满了打排球的人，或两三个人一组，或一群人围个圈，你扣过来我垫过去的，好不热闹。倘若遇到排球比赛，同学们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个排球场围得水泄不通，时不时还会为一个重磅扣球，一个勾手飘球抑或一个鱼跃救球发出“好球”“好球”的欢呼声。那场面那呼声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兴奋不已。正是如此众多的排球爱好者做基础，才有了校男女排球队勇夺上海市少年排球锦标赛冠军的荣耀。而我，当年曾经是一名女排队员，参与和享受了女排夺冠的全过程。

进中学前我没看过排球比赛，也没摸过排球，更谈不上打排球了。一进中学正赶上排球队招生，也许是爱蹦爱跳的天性使然，我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去报名了。当时的我刚满13周岁，已有1米64的个头，长得黑黑瘦瘦的，细细的胳膊，细细的腿，齐耳短发分偏头路梳向一边，用皮筋扎了个小辫，整个就象一棵黑豆芽菜。报名的人很多，也是要竞争的。老师要测试我们的身体素质，看看跑得快不快，跳得高不高，反应是否灵敏，肌肉是否有力量，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我通过了考试，被女排录取了，同班考取的还有许蕴中。回到家里我兴奋地告诉了父母，不料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说，你已参加了游泳队，还要参加排球队，又不是什么搞体育的料子，还是好好读书吧。可

我那时已迷上了排球，我和母亲说，我可以放弃游泳队的训练，但排球是一定要打的。父母理解我的兴趣爱好，最终给予了支持。那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宽裕，四个孩子都在读书。我排行老二，从小就捡姐姐的旧衣服穿，参加排球队后，需要购买新的运动衣裤和护膝，运动鞋几个月就穿坏一双，比淘气的弟弟穿鞋还费。排球队运动量大，又处在长身体的年龄，肚子经常饿，常买些点心吃，外出比赛还要自己掏钱买车票。虽然我的消费支出比兄弟姐妹多，但我的身体也是全家最棒的。

那时的校排球队，按现在的时髦语言算是公众人物。一群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花季少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每天摸爬滚打在球场，奋勇拼搏在赛场，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比赛的胜利，为学校夺得了一个个的荣誉，校园里喜欢排球队羡慕排球队的同学特多。要说最受人追捧的当属主攻和二传了，女排打进攻的周增棠，王其炎，罗鸿仔，徐慧丽，陈青禾，徐涂，二传手王芒，刘仁；男排的张明禄，杨正心，史美进，陈望望等，都是明星级的人物，当年他们都有各自的粉丝，只是粉丝们表达喜欢的方式比现在要含蓄得多。我们女排的超级明星应该属二传手刘仁，她是场上的核心人物，教练的所有战术意图由她来组织，她的中德混血儿模样也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群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中，她那白皙的肤色，匀称的身材，蓝灰色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浅褐色的卷发，往那一站就很吸引眼球。平时她骑单车上学，每当她健美的身影出现在校园，总有无数仰慕的目光投向她，喜欢她的球迷不仅校内，校外也有，可谓远近闻名的排球明星。我们中三班5班的陈青禾也是球队很有魅力的一员。她打4号位，副攻手，身体条件特棒，弹跳好，爆发力强，反应敏捷，头脑灵活，是球队少有的左撇子。她的单腿起跳背飞球扣得非常漂亮，球路刁钻，常常与刘仁合作，出其不意地左手快速出击，在对方尚无反应的情况下为我队赢分。陈青禾是有体育天赋的，后来她果真成了位育中学的体育老师。而我在少年队九人制阵容里一直打后排防守，从一号位打到二号位。至今想起来仍让我汗颜的是，本人一直不会发上手球，也许是胳膊太细了，也许是力气太小了，总之无论用手掌还是用拳头，球愣是发不过网去。发老太婆球平时玩玩还可以，正式比赛是上不了台面的。于是曾指导就让我练发侧手球。发球的威力在于打乱对方的一传使之无法组织进攻，怎样才能把球发得又稳又飘，我一边练一边琢磨，终于找到了感觉，侧手球越发越好。我最辉煌的战果是在一次重要比赛中连发几球，对方都接发球失误，为我队连续夺分，赢得了满场喝彩，打那以后教练和队友对我似乎都刮目相看了。

当然同学们看到的仅是我们在运动场上矫健的身手，漂亮的扣杀和扑救，是赢得比赛后的荣誉和快乐，很少了解和体会我们训练的艰苦。别看我们是一支少年业余球队，但我们的训练绝对是专业化的。只要看看我们的教练就知道女排的水准了。指导曾倩是上海体院的高才生，曾任上海青年女排的主力二传，她不仅基本功扎实，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排球运动发展的新技术新动向，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很强的战术意识，很早就在我们女排运用了“短平快”“背飞”等领先技术。当时的她二十刚出头，风华正茂，高挑的身材，梳着流行的运动头，清瘦的脸庞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她的训练以严格著称。哪个队员偷懒了，哪个队员使小性子了，哪个战术不到位了，她的大眼睛会狠狠地盯住你，直盯得你羞愧的低下头。每堂训练科目她总亲自带领我们去做，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不完成预定指标决不下课。她很少训人，遇到谁有问题就会找来谈心，言语是和风细雨的，目光是充满期待和厚望的。平日里她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尤其和高年级的老队员们嘻嘻哈哈打闹闹的，仿佛姐妹一般。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教练带我们，几年下来女排逐渐形成了“团结紧张刻苦奋进”的良好队风和“快速进攻顽强防守”的技术特色。

在女排的三年里，有几件事是难忘的，而这些故事相信也是鲜为人知的。

一是学习推广日本女排的“魔鬼训练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女子排球运动是日本女排独领风骚。日本女排素有“东洋魔女”的称号，他们的教练大松博文被称为“魔头”，他所创造的超大运动量的“魔鬼训练法”颠覆了女排运动员通常训练的生理极限。“魔女”“魔头”“魔鬼”充满了神秘恐怖的色彩，听起来都有些毛骨悚然。那年日本女排来上海比赛，我校男女排球队被安排前往江湾体育馆观摩大松教练的训练课。我们亲眼目睹了大松“魔头”训练时的那股凶狠劲，也领略了“魔女”们那股不要命的拼劲。记得在练单人防守时，大松扣下的球如雨点般密集，一个接一个不断地砸向运动员的前后左右，只见日本球员忽而一个滚翻，忽而一个鱼跃，忽而倒地单手扑救，一刻不停地在偌大的场地上奔跑翻滚，每组训练每人要救起上百个球，有时累得实在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能动了，大松的重磅球还是不停地向球员砸去，逼得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再次跃起，向迎面飞来的球扑去。场地上“嘭嘭”的扣球声，教练“叽哩哇啦”的训斥声和女球员刺耳的尖叫声，仿佛一首嘈杂的打击乐，把看台上的我们震傻了。听说日本女球员生病发烧或来例假是不允许请假的，这让我们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然

而正是这种充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训练，练就了日本女排过硬的打不死的防守技术，屡屡反攻为胜，为他们国家捧回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的奖杯。这次观摩让我们大开眼界，从此也拉开了我们少年排球队大运动量训练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寒假，为迎接市少年排球锦标赛，校男女排进行冬季集训，全体住校开展封闭式训练。我们女排住在红楼二楼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床，象下乡劳动时那样打地铺。每天清晨天刚亮球队就起床开始身体素质锻炼了。我们顶着瑟瑟寒风绕着操场跑步，围着球场走矮子步（蹲着走），做仰卧起坐，背负杠铃练起蹲，进行60米冲刺跑等等，每个科目都有规定指标。早餐后是技术训练，要完成若干组数百个的滚翻拦网扣发球等基本功训练。下午是战术配合，打模拟比赛。晚上政治学习，记得那时徐寅生怎样打乒乓球的讲话很火，我们边学边讲话便联系实际讨论，还要忙里偷闲完成寒假作业。那时学校没有室内体育场，所有的训练都在露天操场上，黑色的砂石柏油地面上不知留下我们多少汗水。一个寒假下来，许多人的指甲练劈了缠着胶布，我练防守滚翻，磨破了两条运动裤（一条单裤，一条绒裤），穿坏了一双运动鞋，膝盖和手因为与地面的猛烈摩擦而经常破皮流血，体无完肤。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没有一个逃回家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年我们女排继男排两连冠后也第一次捧回了市冠军的奖杯，并准备代表上海市参加在福建漳州举行的全国少年排球女子锦标赛，然而这让我们全体队员欣喜若狂的决定却因文革的开始而惨遭夭折。

第二件事说说女排的团支部。我们进中学的时候，正是政治挂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极左年代，排球队的建设也脱离不了这种大的背景。为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校团委批准，排球队建立了独立团支部，目的是发挥共青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做到思想学习训练三不误。球队团支部没有发展权，仅有建议权。那时对我帮助较大的团员有蒋性媚，吴蓓，徐涤等，她们经常找我谈心，鼓励我积极上进。在球队的几年，确实磨练了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意志，培养了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后来少年队老队长章秀贞离队，曾指导让我担任了九人制比赛的场上队长。女排团支部还多次向我所在的班级团支部介绍我在球队的表现，建议发展我为团员，但屡次遭到拒绝，理由是“骄傲，不靠近团支部，脱离群众”等。所以直到毕业离校，我的胸前也没别上金光闪闪的团徽。中学时没能加入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曾经对我是个挺大的打击，但也是一件好事，让我从此学会了反省，成为人生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



二零零九年原黑龙江兵团七连战友在上海聚会，既不能参加，遥寄以表祝贺

## 行香子

康州雪晴坐窗偶得

霁雪初晴，满目晶莹。叹天公点缀精心。  
松根带水，润物无声。  
羡山间风，林间鹊，晚间云。

试探春情，未见梅英。忆昔年踏访东瀛。  
光阴冉冉，顿似千金。  
任案前书，身前事，眼前名。

## 临江仙

威北修缮寒舍，逢大雪初晴，气象万千，  
余情不自禁。

快雪初晴林壑静，人间一片清新。  
短裘轻杖入银屏。  
满怀冰世界，扑面雪精神。

踏碎琼瑶身未老，山灵爱我钟情。  
此生难负少年心。  
问谁痴若许，应是北疆人。

千里还夙愿，今日聚申城。  
卅年弹指过去，依旧七连人！  
情系边关雪夜，汗洒青春足跡，  
岁月洗征尘。  
更饮一井水，濡沫胜亲朋。

劝战友，歌尽兴，酒满斟。  
不应有憾，回首切莫泪纵横！  
身在天南地北，须信行藏用舍，  
风雨主浮沉。  
最美夕阳好，携手颂黄昏。

### 接上页，难忘的五十一中学排球队

第三件事是排球队吃小灶，用现在的话叫“小灶门事件”。那时候，徐汇区少体校排球班就设在五十一中学，我们男女排球队员都属于少体校的业余运动员。国家规定少年运动员可以享受一定的营养补贴。当时在校搭伙的同学很多，有些是带饭在食堂蒸，有些是买食堂的饭菜，排球队员则是直接进厨房领一份营养菜，也就是所谓的“吃小灶”。当时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物质极度匮乏，城市居民凭票定量供应副食，排球队所谓的营养菜也仅仅是多了几块两指宽的带鱼，抑或一个荷包蛋几根肉丝而已。校园里渐渐有了议论：“为什么排球队吃得比我们好？”“排球队为什么那么特殊呢？”终于当文革的风暴刮起来时，排球队成了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对象，数不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朝排球队压来，大有砸烂排球队的架势，仅仅一夜间，这些曾经被人羡慕崇拜的球星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当时运动来得迅猛，斗争矛头很快又指向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排球队吃小灶那点事被人迅速遗忘了。但我们的教练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批斗，曾指导被剃了阴阳头，关在教室里成天写检查。我们不忍看到一个用全部心血带出冠军队的优秀教练受到如此折磨，但又无力保护自己所热爱的老

师。后来文革结束，曾倩教练回到上海体育学院任教，终于可以人尽其才了。

一九六八年我离开母校去黑龙江插队，后上调大庆油田，九十年代调回上海工作，几十年里我没有再好好摸过排球。二零零叁年校庆的时候，由热心同学联络，在沪的及从海外回来探亲的部分男女排球队员欢聚一堂，遗憾的是女排教练曾倩因重病在身没能前来参加。我们在复兴路的老校园集合，看到昔日英姿勃勃生龙活虎的男女排球队员们如今也已两鬓如霜体态发福，心里不禁唏嘘感叹：“岁月无情，青春不再”。走过操场，那里曾经是我们抛洒汗水，鲜活蹦跳的地方；来到红楼底下那间曾经的体育室，那狭小的外间曾是体育老师的办公室，简陋的里间就是我们球队的更衣室，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又是那么遥远和陌生。走进建立在原小操场上的体育馆，宽敞明亮的灯光球场，泛着油漆光辉的木质地板，一切都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了。在排球场上，大家情不自禁捡起了散落在地上的排球，男女混合玩起来，我在一边观战，脑海里又浮现出四十多年前母校那方兴未艾的群众性排球活动场面；耳畔似乎又响起阵阵“好球！好球！”“五十一加油！五十一加油！”的欢呼声；眼前，一群青春靓丽活泼潇洒的女排姑娘们身着枣红色球衣仿佛正向我走来，她们是：周增棠，王其炎，王芒，周家钧，罗鸿仔，尹慧庄，刘仁，徐慧丽，章秀贞，徐涤，甘克森，陈青禾，蒋性媚，吴蓓，盛芳旖，许蕴中，曾小迅 …。

# 秀野桥， 四鳃鲈和 莼菜

王家斌 65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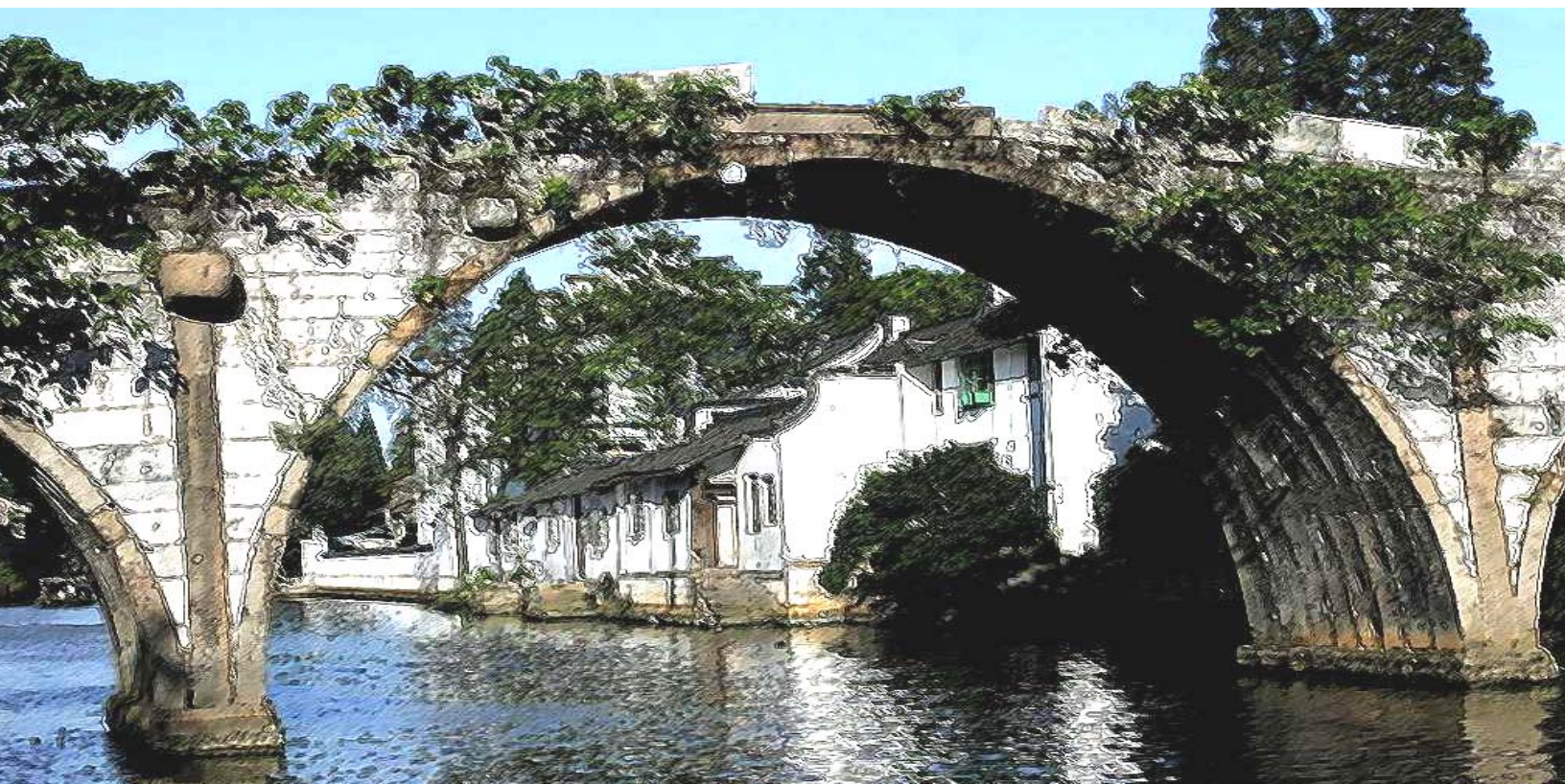
早年听到过一个传说：江南出产的鲈鱼都只有两个鳃，唯有松江西门附近的秀野桥下出产的鲈鱼有四个鳃，所以叫“四鳃鲈”。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夏时节我到松江农机站实习，开拖拉机到农村耕地。我的师傅叫沈继雯，他也知道四鳃鲈的传说。有一次我跟师傅回农机站休整，特地从松江南门外，近米市渡的农机站走到西门的秀野桥，就是想看看四鳃鲈。秀野桥历史悠久，据记载早年间此地筑有木桥，明朝洪武年间改成石拱桥；但我所见到的已经是一座铺了柏油，装了水泥栏杆的，农村里所称的大洋桥了。桥上跑着卡车、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河面还算宽，但也挤满了机帆船、水泥船和小舢板，只在中间留出窄窄的一条水道。整个环境喧闹嘈杂，鱼儿当然难在这儿安生，四鳃鲈的传说也只能是个传说了。然而秀野桥这个有点诗意又有点野趣的名字却从此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七十年代初，我已经在上海郊区的丰收拖拉机厂当了几年工人了。每周工作六天，只在星期六下午回上海市区，星期一早上就要回厂了。但那些年我正是年轻而精力充沛的时候，尽管在市区和工厂之间奔波，还觉得有余力做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正好校友赵国屏（67届高中，五年制）的父亲赵祖康老先生在组织人修订《英汉道路工程词汇》，我和校友陈文乔（65届高中，六年制）就自愿参加进去，用业余时间帮着做点事。此书修订第二版的前言

里是这样说的，“1973年夏，…由原编辑组大部分成员和新参加的成员组成了《词汇》修订组，进行修订工作。”。由此看来，我们是七三、七四年间参加这项工作的。虽然做的是一些抄写、整理卡片、校对资料等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我却从那些参加修订的老先生那里学到了治学严谨、工作认真的好品格，跟他们相处得也很愉快。

因为参与《词汇》的修订工作，跟赵祖康老先生相处得就比较多。赵老先生是一名有名的工程师，曾主持过多项重大的土木工程，并任上海市副市长。他的文史功底扎实，知识丰富，也喜欢跟我们年轻人聊天。他是松江人，有一次谈到了松江的风物，我提起秀野桥和四鳃鲈，他告诉我一个关于鲈鱼的故事，还谈到了成语“莼鲈之思”，说是有人因为思念故乡的鲈鱼和莼菜的美味而弃官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现在从资料上找到的比较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张翰，字季鹰，吴江人。《晋书·张翰传》记载：“张翰在洛，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忘，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我离家在外闯荡二十多年了，静下来常常会思念故乡上海的大街小巷，也思念上海郊区上海县、松江县的黄灿灿的油菜田和碧绿的稻田。每到这种时候，“莼鲈之思”也自然会跃入我的脑海。赵老先生在一九七九年送给我的那本《英汉道路工程词汇》跟着我到了海外，现在就跟其他常用的工具书一起放在我家里的书架上。虽然年代久远了一点，但书里的技术词汇和书后附录里的工程单位换算表、国际单位导出表等表格一点也没有过时，可时时供我翻检，也时时勾起我对故乡和故人的回忆。





近年来看了很多亚洲电视剧，大陆作品居多，港台剧及韩剧也不少。总体来说，觉得大陆做电视剧比做电影更成熟，更花功夫，于是好作品层出不穷就不难理解了。此文不是剧评，恕我不提众多剧名了。

然而，看电视剧是很费精力的。每次全情投入地看完几十集后终于知晓了结局，我往往就开始心疼为此耗费的时间，毕竟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需要自己去做。再加若对看过的连续剧作些专业分析，觉察其中矛盾冲突及悬念的设置，以及为凑集数所作的拖延，就更有一种被编剧和导演所作弄的感觉。既然是自作自受，我只能无奈地胡说什么从此往后凡讲日本人的不看。白血病不看，严刑拷打不看，坏人太多不看，逻辑太笨不看… 云云。如此一来，老公认定我只能看青春偶像剧了，于是向我推荐了一部“家的N次方”，居然使我看完了不仅称好而且还觉得收获不小。

“家的N次方”描写了一群生活在离异后重组家庭中80后年轻人的追求和思维及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曲折和努力。人物刻划得并不很现实但很聪明，有一定深度，拍得也很有美感和趣味性。此剧在大陆年轻族中反响很大，

特别是剧中一些颇富哲理的对白被年轻人在网上广泛传递。然而令我在观赏全剧中无法停止思考的，却是剧中的才女薛之荔的一段并未被网络炒热的台词：

“原来人不是变得漠然，而是必须漠然。漠然在面对一些特殊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最好的保护。让自己学会对一切事情都要放慢反应速度，这样我就能有足够的理智和平静去承受一般人没法快速接受的事情，这样顺便也可以让身边的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依靠。”

在这个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在追求快速，高速，神速，超速的现代化社会中，突然有智者出来提醒人们要学会放慢反应速度，以此求得更大的空间去应对原来以为不可能承受的矛盾和压力，何等聪明！我不由得联想到自己每天在工作中回复大量email的过程中，明明是可以在下午回答的邮件，往往会急于在上午乘兴答复。经几小时思考后却发现已发出去的答复并不尽完美或妥当，不由后悔，有时还得补发解释之类。说也奇怪，有些一看能令人火冒三丈的电邮，过一两个小时再读数遍，竟能读出些道理来，自己的气也就消了大半。放慢反应速度，还真是一种既保护自己又有益于他人的好方法。

当然，无论是漠然还是放慢反应速度，都需要一个更高境界，不是立马能做到的。为了提醒自己在快速工作的同时，说话写邮件前都先想一想，慢一拍，我异想天开地从eBay 上找到一只陶瓷小乌龟，让它每天趴在monitor前瞅着我。我也为原在一个公司上班的一位台湾来的性急的女朋友寄去一只小乌龟，希望它也能助她一臂之力。

我还真不知道小乌龟帮我长进了多少。但每每在繁忙中目光扫到这只可爱的小东西，我会不禁一笑。这已经值了。

## 朝中措

吉力立 六六届

2012年6月，余将移居明尼苏达。  
临别居住十八年之寒舍，唯不忍院  
中亲手栽培之花草树木也。  
念稼轩「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  
鸟好弟兄」之句，良有感慨。

清明过后尽芳菲，小院自徘徊。  
满目昔朋旧友，别来几度春晖。

当空烈日，深秋风雨，苦乐谁知？  
来日枝千万丈，也应记取当时。

## 临江仙

席上有人论功名轨迹，戏作。

宠辱功名都是梦，人生来去匆匆。  
煮酒何须论英雄。  
记得醉翁句，轨迹有无中。

笑指白头追往事，行藏大致雷同。  
做天和尚撞天钟。  
早知风浪险，不教酒杯空。

# 十年寒窗播良种，终身受益结硕果

## 忆母校的课外兴趣小组

周国辉 59届

我是一九四九年九月进入位育小学三年级的，那时上海才刚解放四个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从五十一中学高三毕业，整整十年寒窗。期间值得回忆的人与事，不胜枚举。至今离开母校已逾五十三年了，总想写下一些片段，与学友们分享。但从何下笔？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想从位育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培养入手。尤其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发了青少年的潜能，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提高了动手能力，学到许多书本上与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为社会培养了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母校成功经验的明证。

### 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刚进位育小学时，我才满七岁。班主任潘翠维老师发现我在语言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因为家母毕业于北京贝满中学和燕京大学，从小就用北京话跟我交流。潘老师就推荐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她耐心地帮我分析文章，设计语气，动作与表情。至今我还记得一句台词：“清晨，太阳刚刚升起，老婆婆揉揉眼睛走出草房。”

在她一句句的精心辅导下，我平生第一次登台演讲就获得了奖状。这使得我以后对语言表演增添了信心与兴趣，并不断地参加实践，提高了水平。一九五二年我升入五年级时，见报上登载着“昆仑影片公司”要招考一批儿童临时演员的消息，我即在班主任王修积老师的鼓励下，由妈妈陪我去报名应试。面试地点是在瑞金二路与淮海中路交叉处的一幢五层楼上。那天报名的孩子们，从五楼顺楼梯而下一直排到淮海路拐角的那家绸布店门前。几天后，我即接到了录取通知，参加了王为一导演（他就是解放前，在影片《夜半歌声》中饰演剧场守夜人的老演员）的“为孩子们祝福”的拍摄。记得该剧有黄宗英蒋天流等著名演员。我们只能是饰演群众脚色。这是我第一次踏进电影厂的摄影棚，地点是在离我家步行仅十分钟的肇嘉浜大木桥堍南面。当时的肇嘉浜还是一条终年污水横流臭气冲天的死水沟。水面上经常漂浮着垃圾及死猫老鼠等污物，水沟两面都是用木板铁皮搭成的棚户区。在摄影棚内，我第一次吃到盒饭，很是新奇，还觉得味道比家常菜鲜美。其间，我看到一位中年男演员，坐在摄影棚门口的道具箱上，一面喝着一瓶啤酒，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碗炸酱面，大家都叫他：阿丹叔叔。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他对我们这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十分亲切随和，毫无大明星的架子。几年后，在学校组织我与几位

少先队干部，去为来华访问的“法国青年和平代表团”献花，事先各界代表在市青联的驻地集中时，我又遇到了赵丹。大家在乘车前往上海市人民政府大礼堂的路上，赵丹又为我们讲了几个笑话，引得一车人乐不可支。我至今还记得他一个故事的情节：两个仆人随主人外出赴宴，席间，一个聪明的仆人见主人将饭粒粘在胡须上，就机智地提醒主人：“老爷，松树林里掉了一颗珍珠！”主人立即领会此暗示，顺手捋了一下胡须将饭粒抹去。而另外一位笨仆人见主人吃面时，有根面条挂在嘴边，就大声地对主人说：“老爷，你屁股上有条蛔虫！”主人听后勃然大怒。赵丹在讲故事时，眯着眼，歪着头的调皮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而那晚向法国青年代表团献花时，那位叔叔热情地拥吻了我，他那络腮胡子，扎得我脸好痛。

在斜土路的另一处摄影棚内，我还见到了正在拍摄“三毛流浪记”中饰演三毛的儿童演员王隆基，他的父亲就是上影乐团著名的指挥王云阶。我也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三毛的大圆鼻子，原来是用肉色的类似橡皮泥的材料塑成并粘贴上去的。我们还乘车去上海申新纱厂去拍过一些镜头，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工厂。一九五三年，我进入位育中学，后改名为五十一中学。我们的语文老师是郝重任先生。他曾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的普通话发音纯正，音色圆润浑厚带有磁性，讲课生动形象。他一



米八的大个子，上课时半个屁股坐在讲台角上，自我介绍说：“我在电台是卖嗓子的。”在语文课上，他经常让我范读课文，并及时纠正我的发音，使我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把矛盾的“盾”，读成了“囤”的音，立刻得到纠正。他的严格要求，也为我以后不断地提高语音水平及语言表达能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初二时教音乐的孙漪老师，又组织了我校一些有表演兴趣的同学去中山公园参加一部反特影片的拍摄。我记得那些演员的脸上，都抹上了厚厚的红棕色的油彩，与生活中的形象截然不同。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时，全校的少先队员都集合在操场上，接受李楚材校长，朱家泽教导主任及其他校领导的检阅。当时我任少先队大队长，由我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主持检阅仪式。一九九零年我移民美国的前夕，前去探望当时身患癌症在家休养的原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顾紫薇老师，她将保存了三十多年的当时“六一”检阅的照片交给了我。这些珍贵的镜头常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母校那段快乐的日子。一九五六年秋，我升到初三时，我们班级的六个文艺积极分子，又自导自演了一出独幕话剧《沃瓦的两分》，由我饰演主角沃瓦，这是一个调皮的苏联小学生。饰演老师的是严永媗同学，她高中毕业后参了军，以后调回上海担任“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演出前，我持学校的介绍信前往岳阳路汾阳路交叉口的原“苏联侨民学校”

（后该处改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商借演出服装，得到他们大力的支持。演出是在襄阳南路388弄位育小学内的“藕初堂”（为纪念办学初期的校董穆藕初）。当时，严永媗的哥哥和一位同事前来帮我们化妆。我只记得在描眼线时眉笔扎得我眼睛又痒又痛，都流下了眼泪。事后我才知道严永媗的哥哥就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严



翔，他在电影“城南旧事”和“上海的早晨”等电视连续剧中都担任了主角。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校的文艺会演中得了奖。至今我还留着当年的剧照。但这还不是我的第一次话剧尝试。真正第一次登台演戏，还是在一九五二年我念小学六年级时，老师从全校各班挑选了七个同学，排演了一个朗诵剧《我们都有一个理想》。由六个孩子轮流

上台，向少先队辅导员讲述自己的理想。我饰演一个长大想当解放军的孩子，而饰演辅导员的是我们同届不同班的曹其玮同学。她长得比一般同龄人都高大，形象也很端庄甜美。几年后，她入选了上海市女子排球队，后又被上影厂著名导演谢晋相中，与刘琼，秦怡一起主演了电影《女篮五号》，深受观众喜爱。

正因为母校为我提供了不少语言表达和舞台实践的机会，使我的语音水平及表达能力不断提高，一九五九年我考入上海师院体育科后，我在高三时的班主任张家荃老师则把她的侄女尤赐祈介绍给我，而尤赐祈正是我们体育科高我一届的学姐，她即推荐我进入上海师院广播台，与她一起搭档担任播音员。她即是以后在电影“枯木逢春”中主演苦妹子的女演员尤嘉，以后又主演过喜剧片“大李、老李与小李”等影片。

一九六一年秋，我从上海师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远郊东海之滨的“南汇县农业专科学校”教体育。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一年后在调整政策下学校解散，我又被调到“南汇县新场中学”。那是一所农村小镇上的中学，五八年才开始办高中，仅二十五个班级。但因为该校领导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的活动，因此被评为“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先进集体”。教了一年体育课后，我即因健康原因转行为英语教师，以后又教过音乐、美术、语文、地理等学科。学校领导又充分发挥了我语言表演及普通话的特长，到该校报到后才三个月，经我辅导的同学，即获得了市推普比赛的三等奖。以后，每年由我辅导的参赛节目都屡屡获奖。我亲自创作并导演的配乐诗朗诵：“新场，我的故乡”及由我校二十多位师生共同参加演出的“毛主席诗词联播”等节目，都获得市级比赛的一、二等奖，并在市县广播电台播出。我参加成人组的比赛，每次均获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郊区学校方言还非常顽固的情况下，我与学校推普领导小组的其他老师，一起研究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坚持推广普通话。廿多年中，我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推普骨干和积极分子。我不但在自己学校为各年级的语文公开课录制课文范读，更为我县许多乡镇的中小学录制了不少课文范读。我还被聘为南汇县广播站少儿节目的特约播音员。

一九七二年，我还组织了我校师生，排演了整场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我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李玉和，更兼开场音乐的手风琴伴奏，道具服装的制作及效果，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很吃力，但我又一次积累了京剧演出的经验。全剧仅在新场镇演出了两场即被镇派出所所长叫停而禁演，理由是主演英雄李玉和的我，既非党员亦非团员，且父亲是摘帽右派。而饰演日寇鸠山



的，竟是我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如今想来，这些理由岂不可笑。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表达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憎恨及对第二次解放的欢庆心情，我又一次走上了镇与县里的舞台，演出了姜昆脍炙人口的相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女皇梦》等相声节目。我在舞台上，一反平时在教室中一本正经的教师形象，而极力丑化“四人帮”的嘴脸，博得了广大师生与群众的好评。以后不断地通过相声创作及演出，我的知名度不断提高，俨然成了南汇县小有名气的相声演员。我还在县工人俱乐部演出过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打快板的技巧，我是向到南汇演出的上海快板书的演员黄永生请教的。以后我还将京剧《磐石湾》片断，改编为快板书《刀出鞘》到县镇各处演出。还联络了新场镇十几位群众文艺的积极分子，排演了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丑恶嘴脸的多幕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当时在全镇与全县反响很大。时值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魏宗万（曾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扮演司马懿一角）与聂雅亮（五十一中学六一届高中毕业，原校话剧组成员）来我镇访问，我即虚心地向他们请教舞台调度等技术问题，更多地丰富了我的舞台经验。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上海市首届教师节影视演讲比赛”。我以“为人师表其乐无穷”为题，以亲身经历畅述了作为一名灵魂工程师的自豪心情。内容真实感人，荣获一等奖，并在上海电视台“当代青年”专题节目中录像播出。学校的师生及亲友们，看到电视后都纷纷向我祝贺。第二年，我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电视台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赴上海市松江县慰问烈军属。以后，我还参加由上海市教育局文字改革委员会组织的“朗读研究小组”，专程去上海县及崇明县的师范学校，为未来的教师们讲授朗读技巧。并作示范演出。一九八八年，“朗读研究小组”又排演了一出朗诵剧《人人都讲普通话》，由我担任领诵，并由上海电视台向全市实况播出。我还在下课后，由郊区赶往上海，为一部两集的美国电视剧《失踪》配音，经常搞到半夜，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学校。虽然路上来回要四个多小时，我也乐此不疲。暑假中，我还应友人之约，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奇遇》配过音。一九八七年，我与南汇县教工艺术团的老师们，还在县少年宫演出了话剧《百万马克》。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也会应邀去县少年宫，为孩子们表演相声，讲故事。二十多年来，在南汇县群众文艺的舞台上，常常看到我的身影，我表演过快板、相声、对口词、三句半、单口相声、讲故事、钹子书、双簧、独脚戏、诗朗诵、独唱、重唱、表演唱、小歌舞、话

剧、方言剧、京剧、快板书、小组唱、合唱指挥等不同形式的节目，集创作、导演、演员、主持、伴奏于一身，忙得不亦乐乎，被友人们戏称为“怪”。而这些表演技能的学习与提高，则与当年母校对我的兴趣爱好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当然踏上社会后，我也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虚心求教，大胆实践。我曾去上影厂著名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的家中，向他请教朗诵的技巧，也请译制片厂的著名演员毕克到我家中指导。直到一九九零年移民美国进入“华特迪斯尼世界”的EPCOT CENTER主题公园的“中国馆”后，我仍是发挥了我的特长，担任公司每年的职工“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与主持，当然也少不了我的演出。十八年内，我在公司联欢会上曾演出过独唱、重唱、魔术、手风琴伴奏等节目，深受广大员工及领导的好评。

### 造型艺术技能的培养

母校对于有艺术爱好及特长的学生，是很注意培养的。我从小在舅舅的影响下，喜欢收集有水浒人物的香烟牌子，也喜欢在纸上画飞机，坦克，军舰等，还用橡皮泥捏制动物或京剧脸谱。位育小学的美术课老师是赵超人，我们都叫他“稻草人”，他说话、举止都是慢条斯理，不急不躁的。美术课上除了画石膏模型外，他也很注意对我们动手能力的培养。我们画过花布图案设计，用马粪纸及彩色腊光纸制作礼品盒，制作小飞机和舰船模型，制作小马达，万花筒等。

一九五零年，我四年级时，画了一幅约有四开纸大的水彩画“国庆天安门庆典”，得到了赵老师的赞赏，以后我一直担任班级的政宣委员，负责班级黑板报，墙报专刊的编排，美工装饰，这也为我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机会。一九五一年，学校组织大家为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献礼活动，我即在母亲的指导下，在一方白布手帕上，用红线绣上了“打败美帝野心狼”七个红字，献给了正在朝鲜冰天雪地中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叔叔。在小学六年级时，我迷上了连环画上的人物，上课不专心，经常在课本边上的空白处，描画了不少人物。还自制圣诞贺卡，寄给国内外的亲友长辈。

一九五三年我考入位育中学，在自己报名与老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徐汇区“少年之家”的美术小组，地点在安亭路一条幽静里弄尽头，一幢法式风格的两层花园小洋房内，邻近就是建国西路与乌鲁木齐路交叉口的“捷克领事馆”。我被分配到雕塑小组，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雕塑这一美术形式，但却成了我终身的追求与无法实现的梦想。指导老师首先发给我们每人两根竹片及两根粗铁丝。然后要我们根据图纸与实物，自制雕塑工具：刮泥刀及造型勺。接着教我们如何将黏土粉和水，摔打成软硬适中



的泥团。第一件作品就是每人按照自己捏拳的左手为样子，先塑成泥坯，一个星期后，再将泥坯翻铸成石膏模具。待模具全部干透后，再浸入水中，挖出原始的泥坯，最后再浇入石膏。待干透后，敲去模型，呈现在我面前的，则是一个石膏的自己的左拳。还需要用芨芨草打磨作品表面使其光滑，整个过程耗时三周。因为仅每周六下午活动两小时，每次制作都需要耐心、细致。当最终看到自己的第一件雕塑作品完成时，就像是母鸡看到了自己生下的第一枚鸡蛋，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从此激发了我对雕塑的浓厚兴趣，但苦于始终没有机会师从专业再学习再提高。这也成了我毕生的一大遗憾。那年冬天，我又被“少年之家”推荐去上海市少年宫创作泥塑作品，并将送苏联参展。我第一次进入延安西路原犹太商人哈同花园的市少年宫，犹如走进了童话中的宫殿，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北面，耸立着一座造型典雅巍峨的白色主体建筑，气派恢宏壮观。由东西两边围绕而上的大理石阶梯，把人引上二楼外走廊，进入大厅后，屋顶垂悬着的水晶吊灯，犹如一大串晶莹的葡萄，打蜡地板光可鉴人。我们近十位小雕塑家集中在二楼东侧的大厅内，创作了近一周。时值隆冬，室外寒风呼啸，室内却热气腾腾。大家一面和泥制坯，一面聊天唱歌，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我创作了一尊高约25厘米的立雕“中朝人民并肩作战”。事后听说在翻铸石膏后运送到苏联参展的途中，因保管不慎，损坏了一些作品，也不知我的大作是否安抵苏联？

在“徐汇区少年之家”及市少年宫接受了入门学习后，为了提高自己的雕塑水平，我又自学了一些有关雕塑技法的书籍，并利用业余时间大胆实践。一九六一年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也用黄泥黑泥等不同黏土，塑过不少作品。例如“鲁迅”头像、“越南爱国志士阮文追就义”的立雕、“威武的非洲战士”立雕、“三毛头像”等，还参加过上海市青年宫的美术展览，在南汇县文化馆组织的美

术创作班上，还创作过“军民鱼水情”与“初生牛犊”两尊立雕，均获奖。以后因几经搬迁，现在仅留下一些照片及一尊黑人头像，其余作品均已散失。而这唯一留下的黑人头像，是我在七十年代创作的。那年学期快结束时，我因打排球不慎扭伤右脚踝关节，暑假中只能待在家中，哪儿也不能去。适逢父亲出差无锡，我则请他帮我到惠山脚下去挖一些黑黏土来。几天后，父亲果然提了重重的一网袋黑泥土回来，支持了我热爱雕塑的兴趣爱好。如今父亲已于去年年底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了。而这尊头像也寄托了我对他的思念与感激之情。一九九一年初，我进入奥兰多的“华特迪斯尼世界”的中国馆时，就是带了两件雕塑作品去应聘的：一件是彩色面塑的弥勒佛，一尊是我本人头像的浮雕。经理当时就聘用了我担任专职的美术师。我就是以这门一技之长作为移民美国后的谋生手段，从此也开始了我在迪斯尼十八年的打工生涯。学习雕塑专业成了我这一生除了声乐以外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因为离开位育后，就再也没有专人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多亏当年在母校的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中打下的基础，才少走不少弯路。

一九五八年我念高二时与同班好友周克希（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现为沪上法国文学著名翻译家）、林枫（退休前任上海市航道局总工程师）等几位志同道合者，组织了名为“开拓者”的木刻兴趣小组。我们利用课余时间，搜集资料，购买工具，以最廉价的五夹板为材料，无师自通地干了起来。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创作了不少作品，有“鲁迅肖像”，“苏联红军纪念碑”，“欢庆六一”等。我还根据当时全校师生正在大炼钢铁的情景，创作了一幅“反射炉炼钢”的作品。我们当时就在红楼三楼学校的一间小油印室内，自己拓印，虽然两手和衣服上都沾上了油墨，但是看到自己的作品，一幅幅拓印出来，分赠给同学时，内心的喜悦与成就是无法形容的。

在中学兴趣小组打下的美术底子，到了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学校的黑板报，大批判专栏的美化，教学活动时大幅标语的制作，各类会议横幅的制作，都离不开美术。一九六二年，我刚调到南汇县新场中学，即被镇政府借调去，在镇上大街两旁的白粉墙上，绘制了几幅2X3米的大型壁画。文革中，美术馆又组织我与其他学校的美术教师，在沪南公路沿线的醒目处，绘制大型的宣传画“毛主席去安源”及“金训华”等，每幅作品都要攀爬上两层楼高的毛竹搭建的脚手架上，腰间缚上了安全带，才能放心作画。我还为位于周浦镇的南汇县烈士陵园创作过“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国画作品。在历届南汇县及新场镇的美术展览中，我创作了不少不同题材不同材质或

形式的美术作品，有油画、水粉画、国画、贝壳粘贴画、粉画、植绒纸刮画、瓷盘画、商标设计、泥塑、书法等。还被选为新场镇“新竹书画社”的副社长、南汇县“青年美育协会”理事。

在一九九零年移民美国，并进入迪斯尼世界后，成了中国馆的专职美术师，为广大游客在T恤衫上绘制花鸟山水，人物禽兽等，还在EPCOT CENTER主题公园员工大楼的走廊墙上，仅用了两天时间，创作并用丙烯颜料绘制了一幅2X1.5米反映中美友好的“米老鼠孙悟空携手同游长城”的大型壁画，受到了领导与广大员工的好评（有照片为证）。除了在T恤上为游客作画外，我还自学了篆刻，当场为游客将姓名译成中文并刻在青田石上，为公司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服务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当年在母校兴趣小组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 音乐表演能力的培养

我对音乐的爱好的，主要是受母亲的影响。她喜欢唱歌，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全民抗战初期，她在武汉参加女青年会的歌咏宣传活动时，曾与著名的歌唱家周小燕同台演出过。童年时代，母亲常教我们几个兄弟哼唱一些世界名曲及中国民歌。她把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一本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101首最动听的歌曲》）当成至宝，从中她教会了我“老黑奴”、“我的肯塔基老家”、“甜蜜的家”、“灵车从天上来”等美国乡村歌曲，至今不忘。因此我们家中经常歌声不断。但童年的我，只沉迷于单纯的模仿，不懂得科学的发声方法。记得在小学上音乐课时，老师让两位大同学将一架脚踏风琴抬进教室进行教学。在四年级时的一堂音乐课上，老师要我们每人自选一首歌曲作为考试内容。我当时才九岁，却强压着稚嫩的童声，试图用男低音的嗓音选唱《国际歌》。当然效果可想而知，引得全班同学大笑不止。我却羞红了脸钻到了课桌底下。五年级时的暑假中，我被学校推荐去徐汇区少年之家暑期活动室当讲解员，地点是在如今的永嘉路第二小学内。我与另一位女同学巢志钰搭档，她的姓氏很特别，以至于六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我们俩首先向小同学们介绍了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尔罗伯逊的生平，然后用电唱机播放了他的著名歌曲《老人河》。我至今也难忘他似乎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低沉、哀怨、浑厚宽广的歌声。进入中学后，我参加了学校合唱队，在音乐老师朱瑚先生的指导下，不断地提高了视唱、识谱的能力和對音乐的兴趣。我又参加了学校的民乐小组，自购了二胡，在老师耐心的指导下，从基本指法开始学习，一个学期后，我就能比较流畅自如地演奏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良宵》了。以后又学会了《光明行》和瞎子阿

炳的名曲《二泉映月》。民乐组的指导老师的姓名，我已忘了，只记得是位中年男老师，戴一副黑框眼镜。他对指法的要求很严格，为我以后听音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以后，我又自学了竹笛、京胡、口琴、凤凰琴、夏威夷吉他、单簧管、钢琴、尤克里里等乐器。

一九六二年调到新场中学后，我看见办公室角落里有一架手风琴被闲置着，因为无人会演奏，而积满了灰尘。我即自学了手风琴，以后又兼任了初中六个班级的音乐课，背了这架手风琴边弹边唱。又组织了校合唱队。一九六五年秋收时节，我组织了学校第一支文工团，自编团歌，背着手风琴，扛着红旗，带队下乡边参加三秋劳动，边在场头地角为广大的贫下中农宣传演出自编的三句半、小快板、表演唱等短小精悍的节目，深受广大社员的喜爱。文工团员从学校毕业后，有的担任了县文化馆的馆长，有的成了农村群众文化的积极分子，为南汇县的群众文化的普及与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多年来，经我排练指导的独唱、重唱、表演唱、大合唱等声乐节目，都在县市中学生及职业学校汇演中屡屡获奖，奖状挂满了学校会议室的四壁。学生毕业后，有的考入了县沪剧团或越剧团，有的考入了上海沪剧院。同时，我又组织了南汇县第一支男声小合唱的队伍，利用业余时间，到各镇、县宣传演出，为推动南汇县的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作出了不少贡献。合唱队中的骨干，还担任了“南汇县歌友联谊会”的会长。而我本人也常参加县市一级的声乐比赛，屡屡获奖。由我组织排练并兼指挥的“新场镇百人合唱团”也在全县歌咏比赛中，荣获一等奖。我还经常与其他歌友下水利工地下工厂去军营为工农兵演出，在田头、海堤、车间引吭高歌。乐此不疲。曾与我一起搭档二重唱的宣传队员，有的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上影乐团。有的考入了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在全军文艺汇演中屡获荣誉，被誉为“军中百灵”，最后升任文工团团长。在进行声乐教学的同时，我还在市县及全国一级音乐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歌词或谱曲的作品。一九八五年，我被调到新场幼师职业学校任教导主任，并兼音乐及语音两门课，更使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几年后，我培养的幼师毕业生在县里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并在县市一级的歌唱比赛中屡屡获奖。一九八七年我与好友郭老师两个家庭共六人，又参加了上海市第三届“卡西欧杯睦邻家庭演唱比赛”。复赛时，全市十个区县共三十支参赛队伍中，我们两家的组合以288.1分的成绩独占鳌头。但在半决赛赛时，因选材不当，没有发挥出我们应有的优势而败北。上海电视台对此都作了实况转播。虽然最后只获得一架小电子琴作为奖品，但至今我对声乐的兴趣不减。这辈

子，我虽然没有机会进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声乐训练，但一有机会，我就会虚心地向声乐行家们请教。我曾毛遂自荐地去登门拜访过住在我家附近襄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黄钟鸣教授，还去上海音乐学院，探访当时正在上海演出的湖南民歌演唱家何纪光先生，还去上海师大音乐系主任徐朗教授家请教，去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陆廉老师处请教。我购买了不少声乐教材，收集名家的录音带，然后模仿练唱，更争取不少演唱机会及舞台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声乐水平。一九八八年，我被上海市教育局评为“中学音乐高级教师”，并担任南汇县中学教师职称评审小组的成员。一九九零年移民美国后，仍很关心国内声乐界的动态。我还是南汇县歌友联谊会的海外特别会员。经常为国内的词刊作词谱曲。二零零八年，我参加全国群众歌曲创作比赛，我的歌词《故乡的小桥》还获得银奖。在迪斯尼工作期间，我还参加过一次迪斯尼员工的技能大赛，我选唱了两首中国民歌，当然评判员们无法听懂，但我还是争取了一次锻炼的机会。一九九四年除夕，我还应邀为“中佛州中美协会”的联欢晚会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与《爱的奉献》，并获得感谢奖牌。二零零四年我又在《美国退休者协会》的中国书法讲座时，为老人们演唱了《老黑奴》等歌曲。当然，在我工作的中国馆每年的全体员工春节联欢晚会上，总少不了我的独唱及为同仁们的演唱作手风琴伴奏。二零零一年七月，当得知中国申奥成功的消息时，中国馆的年轻员工，自发地在宿舍区内游行庆祝。我即背上了手风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大家伴奏“歌唱祖国”等歌曲，整整兴奋了大半夜。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后，我出国十八年第二次回国，在北京天坛公园的群众歌咏区，我唱了一首“北国之春”，当唱到“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才能回你怀中？”时，不禁泪如雨下，不能自己。去年世博会期间，我与“南汇歌友联谊会”的歌友们去浙江参加“农家乐”旅游，在长兴市的广场上，我又自告奋勇地为广大市民们献歌一首。时逢重阳，我又去当地的老人康复疗养院，为十几位老人作慰问

演唱，深受欢迎。如今，我虽年近古稀，仍然觉得心中还有一股激情。每逢老朋友或老同学聚会，我就会即兴为大家演唱，活跃气氛。我甚至梦想，有朝一日，我也能踏上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为全国人民高歌一曲。前年我在加州参加了一个去北加州拜谒圣山——夏斯塔雪山的旅行团。在旅游车上，我一路为大家讲笑话、猜谜语、唱歌，同时讲授唱歌的三个要素：发声、呼吸、咬字与吐字，既为大家消除了旅途的疲劳，又普及了声乐知识，多次获领队表扬及朋友们的赞赏。这也算是我退休后发挥的余热吧。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在美术与音乐上继续深造，但当年母校的兴趣小组，对我的培养早在我心中播下了种子。它们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受益匪浅。而我个人大半辈子的经历，也证实了母校这种教育方法的成功。

除了以上我谈及的戏剧美术音乐的兴趣小组外，我还参加过学校的“木工小组”及“航海三级训练”等课外小组。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与适应环境的技能，使我能更好地立足社会，为社会服务，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有用的人，并在不同的领域内取得一些成绩。

我衷心地感谢母校给予我的一切。仅以此短文，表达对母校的怀念与感激之情。我自豪，我是一个“位育人”。

附注：我于1990年5月移民美国。1999年1月28日，中国国家人事部专家服务中心的中国专家大辞典编审办公室给我通知，认为我已符合入编条件，限20日内将个人资料加盖公章寄回。但此信转至美国已超过时限，我亦未能寄出资料，故作罢。

编者注：文中照片由周国辉校友提供，雕塑是周国辉校友在课外兴趣小组时的作品。

## 乡音难改

周国辉  
五九届

少小离家，漂泊海外，  
容颜虽老，乡音难改。  
嘎嘣脆的京片子，  
一声招呼暖胸怀；  
粗门大嗓关东腔，  
吴语软语透海派；  
湘粤川语热辣辣，  
豪爽亲切包着爱；  
晋陕鲁豫中原调，  
铿锵高昂多豪迈；  
唐人街上闻乡音，  
乡情浓得化不开。  
浪迹天涯，五湖四海，  
容颜虽老，乡音难改。  
乡音连着华人的心，  
炎黄子孙是一脉；  
孕育文化与传统，  
乡音犹如是脐带，  
割不断的华夏情，  
传了一代又一代。  
老乡见面泪汪汪，  
只因乡音传递爱，  
背井离乡几十年，  
叶落归根总要回来。

# 旧雨新知，都是位育人

宓哲新 67 届

每年的北美位育校友会聚会让我们增进老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有机会结识更多新朋友。2011年9月在明州的聚会就是这样一次盛会。还在聚会的组织期间，王师尧、叶善章等老同学就来邀我参加，薛兰芬老师及其女儿王忆也来相约，后来还有曾壁华等纽约的朋友也都答应参加，更少不了同学聚会的积极分子，老同学蒋青，所以我们就订了机票旅馆，并积极参与组织活动。

在聚会的几天里，旧雨新知，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题。王师尧带来了漂亮的新娘子马兰，和曾壁华一起来的陈榴大姐是55届的前辈，最年轻的是戎子泓小弟弟。吴攸承、许建是在2007年聚会时就认识的，叶秋怡、瞿德霖、孙雯的大作经常在钟声上见到。我对初次见面的孙雯说：“我是你的粉丝呢。”这么多位育人欢聚一堂，真是分外亲切。

薛老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这次见到她仍旧步伐矫健，精神抖擞地同我们一起到处游览，真为她高兴。她跟我谈起学校里的一些人和事，还讲给我听当年她父亲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故事。祝薛老师健康长寿。

瞿德霖、陈红夫妇为组织聚会，招待客人化了大量时间精力。瞿律师不但热情好客，还特别细心。我们和曾壁华、陈榴住在旅馆，去密西西比河那天要早起，我们要求旅馆wake-up call。可是那天早上旅馆前台并没有叫我们（这家乌龙旅馆却在第二天5点叫醒了我们），幸亏瞿德霖打电话来嘱咐我们天冷多穿衣服，才没有误了大事。

另一对热情的主人是吴雪薇、熊陆夫妇。熊大哥是艺术家，吴教授是教育家，她教书育人的事迹令人印象深刻。

我在学校里时是团委宣传委员，与学生会宣传委员吉力立一起负责学校的黑板报《钟声》的编委工作。我是从64年做起到66年文革为止。当年《钟声》的同事，多年也没有联系，很高兴有这次聚会。我们应邀去了吉力立、林嘉陵的新家，他们刚从威州搬到明州不久。

周家钧当年是我们51中学话剧队的队长，我那时是初中小妹妹，她带领我们排练，还请来在青年话剧团的51中学校友当导演。话剧队排了一幕话剧《年青的一代》，周家钧演女主角林岚。第一次演出时，演林父的陈少泽发高烧不能上台，临时找了学生会主席林皎明来顶替，我躲在台边给他提台词。我们初中队员演诗朗诵《五封信》，周家钧组织人做道具，找服装，还帮我们化妆。这次周家钧和先生阮维仁一起出席，四十多年没见了，一见到她，马上认出来，她还像当年那样英姿勃勃。

由于我们到得较早，于是凭着Google Maps的帮助，找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MIA) 去参观，还把叶秋怡和孙惠民两位一起带去了，牺牲了去植物园的机会。幸亏MIA收藏丰富，有许多艺术精品，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大量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品，叶、孙两位都很喜欢，算是不虚此行。MIA是个大型博物馆，其永久收藏超过100,000件，却是免费开放，可见明市政府和人民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和支持。明市还有许多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又是美国第三大戏剧市场，有许多剧场，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一一欣赏，只能留待将来有机会再去明州了。

三天时间匆匆就过去了，新老朋友们仿佛谈得还不够尽兴，大家相约来年再聚会。明州聚会的美好时光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 皱纹的形成

周国辉 五九届

你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  
就像那龟背上难认的甲骨文；  
没人能读懂它的含义，  
却记载了你沧桑的人生。  
文革时期的「红色恐怖」，  
在你年轻的额头刻上第一道皱纹；  
因为你时时紧锁双眉，  
去苦苦思索那些难解的疑问。  
十年浩劫历次运动，  
又在你的眼角画上道道皱纹。  
它是你时时眯细着双眼在观察，  
流露出惊恐与警惕的眼神。  
中年生活重担的风雨，  
也在你的两颊刻上辛劳的皱纹；  
这是你紧衣缩食敬老爱幼，  
咬紧牙关留下的印痕。  
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磨难，  
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理不清的家庭矛盾，  
为了大局你宁肯苦果独吞，  
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你毅然为下一代背井离乡移民时，  
已步入生命的黄昏；  
但愿晚年的生活象和煦的春  
能抚平你那可敬可叹的皱纹。

# 蒋衍老师二三事

陈怀志 74届

蒋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74届7班）。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位很典型的上海“挺括的老克拉”，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溜光滴滑。西装裤子始终烫得笔挺，上面的两把刀磨得交关锋利。一双“五香豆皮鞋”锃亮。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派克”笔，很有派头。

有一次我偶尔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也翻得一支“派克”笔，就急忙拿去给蒋先生看。他拿起笔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郑重其事的说：“喔哟，依格这支是“派克”金笔嘛，我的是“派克”银笔，阿拉格笔正好是一对嘛！”

蒋先生不但钢笔字极棒，而且还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黑板报。他告诉我们，在黑板上写字时要转动粉笔，这样字就不会越写越粗。（这一招居然成了我的座右铭了，



我就运用我的小聪明，把这一方法用到了铅笔上了。以致于现在写字时，我也不停地转着铅笔。可见得蒋先生对我的影响之深）。我心里

时常暗自高兴：这下可好了，我可以既抄笔记，又可以临摹蒋先生的书法了！我们同学间常常拿他和陈文高老师比，谁更“老克拉”，结果还是蒋先生赢！

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吴锐众同学跳高跳不过去（虽然竹竿放得并不高，可他有恐高症），蒋先生在一旁看得很着急，就说：“其他同学都跳过去了，怎么就不行？看我的！”说着就上去做示范。可是他蹬着“五香豆”皮鞋，紧跑几步冲过去后，不但把竹竿踢掉了，而且还仰面摔了个四脚朝天！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蒋先生初接我们74届七班时，自我介绍说他在师大读书时曾是一个调皮的学生，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学校。好几次学校的大铁门关了，他不得不冒着衣服被钩坏，裤脚管被钩掉的险爬进去！他怕被巡逻的发现，常躲在厕所里抽烟…。

蒋先生还介绍说他在大学时就被发现腿上有癌症。医生建议他锯腿保命，可他偏不信邪，说是宁愿死也要保个全尸！当时我也是个调皮的孩子，因为在家时常受到兄辈画画朋友们的熏陶，影响。于是，一日在课堂上突发奇想，灵感涌上，居然控制不住，提起笔来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我脚踩着蒋先生的腿在一条板凳上，一手拿着木匠用的锯子，一手摠住蒋先生的腿，拼命地在锯他的腿！我在下面专心地作画，在得意之时，禁不住摇头晃脑，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待到蒋先生走到我面前时，竟全然不知！蒋先生轻轻地把画纸从我手中抽去，看后微微一笑，转身回到讲台继续讲课。当时我吓得差点瘫在椅子上。心想：这下完了，蒋先生肯定要到我家去找我妈妈了！这是我最怕的事了，因为我不想让妈妈白天在单位挨批斗，晚上回来还要为我操心。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事后蒋先生居然没上我家去，也没有找碴插我，却是让我负责我们班的黑板报。以后又委我以班级“政宣委员”的大任！可见蒋先生的肚量真的大到能撑船！我也不知当时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想法要把他的腿锯掉，是为了帮蒋先生省医药费，还是要救蒋先生的命？！直到现在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前几天忽然得到蒋先生因患胃癌，不幸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在我们身边又走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蒋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却永远留在了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生师长、各位亲戚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母亲、弟弟及全家对于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向他作最后的道别，分担我们的悲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父亲住院的第二天，他让我带些纸笔给他，几天后我在他的床头柜中发现一篇刚刚开了头的回忆性的文稿，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盖棺论定一般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作出的历史评价的最基本的做法，因为人比较复杂，想的说的和做的、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都可以迥然不同，所以对其下定论只能是盖棺以后。我们这批人也到人间兜了一圈，现在年龄都已古稀，虽还没盖棺，但余下的时间已不多了，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也干不了什么坏事了，所以作为个人小结，谈谈人生感悟已是时候了”。

父亲在他76年的人生旅途中感悟到了什么，他未能说完整，因为他仅仅对我口述了一个纲要，但我作为他的儿子，想借此悼念他的时刻，谈谈我对父亲一生的感想吧。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普通是因为历史学科在整个中学课程中不是主课，其次，我父亲也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一辈子讲授一个学科、一辈子工作于一个学校，辛勤工作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学校和他的学生在为他做盖棺论定称“其为人师表，他具备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对学生的表率作用。”

纵观父亲一生他最被人称道的是授课生动、形象、有趣活泼，精彩独到的板书、设计巧妙书写漂亮，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头发。几十年来不管风吹浪打、寒暑冷暖，蒋衍老师的头发永远是纹丝不动、乌黑光亮。

父亲认为，作为老师乃至作为个人应该树立良好的外表形象，他永远让自己以风度翩翩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对形象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富有信心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大家的尊

重和爱戴，我问过我的父亲，你这板书设计的最初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是为了在上课期间不擦黑板，不让粉笔灰尘沾污了衣服和头发。我不知道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但不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可回味一下其中的意味。真正的为人师表是高尚的个人思想情操与完美形象的统一。

蒋衍是位好人，这不是因为我对父亲盖棺定论时的溢美之词，这是每一个到医院来看望他的领导、师长、同事、学生和朋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从4月18日到5月17日，我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整整一个月中来医院看望的人数达1000人次之多，从90多岁的退休的老教师到80后毕业的小学弟，对蒋衍老师称赞异口同声出奇的一致。

父亲在为自己盖棺定论是说，人说错话难免但不能说假话，要讲真话，要真心地对待校友、学生，尊重学生尽量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那天在医院的晚上他早已熄灯就寝，突然他睁眼要我替他打个电话给一个过去的学生，原因是这学生曾托父亲为他儿子找个女朋友，在父亲的帮助下，那对青年男女有了初步的接触，但进展如何，重病中的父亲仍然牵挂着，可他自己离生命的终点已在咫尺之间。

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这世上人间的真情，人间的冷暖，人们永远会珍惜，永远会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他人之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近千人次来医院探望父亲的人群中，吴标元老先生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吴老先生已年逾九旬，双手拄着拐杖、双脚迈着蹒跚的步伐，颤颤巍巍从浦东三林桥来到医院，坐在父亲床傍、注视着父亲久久说不出话来，而父亲已虚弱得无法坐起，只能十分激动地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吴先生是硬汉！两位老人默默无言相对。几十年的真诚情意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两位古稀老人间在过往的岁月中是如何结下深情厚谊的，我现已无从得知。但这历经岁月沧桑、终身难忘的情谊深深地打动着。

我父亲生了二个儿子，而都远涉重洋，飘泊海外，这



真想再回到那纯真的年代——  
 如花岁月，黄毛少女；懵懂无知，情窦初开。  
 仰慕恩师，博学风采；尽享友谊，憧憬未来……  
 好想再重温那青涩的年代——  
 诵《金蔷薇》，吟《山楂树》；诗中觅愁，歌中寻爱。  
 心仪《牛虻》，苦熬《白夜》；《静静顿河》，徜徉徘徊……  
 更想检讨那火热的年代——  
 黄浦滩头，学工炼钢；马桥乡间，支农教改。  
 赛诗会上，飞扬文采；《钟声》激昂，红楼气派。  
 无法忘怀那感伤的年代——  
 负笈京华，浮沉书海；梦迥江东，仰天长慨。  
 少年忧国，常感无奈；何日云开，民富国泰？  
 ……  
 弹指五十载，地换天改；历数同侪，发小何在？  
 执手相望，鬓发斑白；莞尔一笑，当年神态！  
 人生过半，美梦不再；清风朗月，悠闲自在。  
 得失我知，功过任裁；活出快乐，无关成败。  
 毋相忘共窗三年，情同手足，铭心刻骨，融入血脉。  
 莫辜负师长厚望；认真清白，严谨笃实，诚信为怀！  
 诚哉！位育精神，硕如松柏，深似大海！  
 壮哉！位育传统，青春永在，流芳百代！

## 接上页，悼念父亲

对年迈的父母实属憾事，谁曾料到，从父亲住院的那天起有一群学生以轮流值班的方式来医院照料父亲。每天清晨送上鲜榨的果汁、可口而又富有营养的菜肴，每天换洗衣服、梳理头发、擦身洗脸，更有甚者每天早上五、六点到医院照料完父亲再去上班。甚至连我和母亲的饭菜都有专人送来，还有人每天都以他那诙谐幽默的话语来打消病人的顾虑、鼓励与病魔作斗争的勇气，他们不是子女却胜似子女。他们是74届7班和8班的学生，都已年过半百，都已为人父母。37年过去了，岁月变迁日积月累的师生之情浓似血。他们给重病中的父亲带来极大的欣慰，黄浦江水深千尺，不及学生送我情！父亲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学生待我这么好！37年前父亲曾对他们说过，用不了五年或十年的时间你们就会把我忘了，但事实是，直至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整齐地站在父亲床边深深地一鞠躬，祝蒋老师一路走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法解读这段师生情的奥秘，随着了解的增多，从学生们点点滴滴的回忆中。我方才明白，从当年下乡拉练起直至学生毕业、就业、婚恋、成家、育儿乃至他们儿女们就学、毕业、工作、成家，都

有着父亲的一份辛劳。

一个人做一天好人很容易，做一个月、做一年的好人不是很难，但做56年的好人而不求功利，此举难难于上青天！他是一位极其不普通的好人，他得到了极其不普通的爱戴和回报，他是一位极其不普通的中学老师，为此他死而无憾！

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倾注真诚的待人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列车已不可逆转之际，向来看他的人们以极其富于诗意的方式向人们告别，再见了，让我们相会在梦里！

这整整一个月在父亲身边的日日夜夜，我才发现我真正地了解了父亲，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我也深深地感到遗憾，没有来得及在他老人家生前聆听他对我们更多的教诲，没有来得及给他更多的回报。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的心碎了！

父亲，敬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母亲，好好培养我们的后代。我们将相会在梦里，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父亲，一路走好！



# 高尔夫

萧亦麟 67 届

十年前曾经投稿《钟声》，浅述在美求学，打工，养家糊口之余，传承五十一中学课余以排球健身的习惯，参加贝尔实验室和社区业余排球联盟活动的点滴。并有机会在饭后，工余时间学习美国西部牛仔走步舞，附加华尔兹，恰恰等国际标准舞步。历经“不惑”至“知天命”的十年。

随着“五十肩”的隐现，开始意识到除了偶尔的按摩，拔火罐能暂时缓解一时的不适，琢磨着找一件每天随时随地都能摇肩晃脑，转腰扭臀的新乐子。那就是开始在家里把地毯充绿茵，到后院把小坡当果岭，土法上马练习起庭院式高尔夫。天冷下雨在室内练推杆，一有机会就上草坪打野草。

第一步的投资只是一根推杆（Putter），一根七号铁杆（Iron），再加一根一号木杆（Wood）。走了三、四家体育用品商店，见识了十多种知名品牌，但原则上是哪儿便宜就在哪儿买。当时的心态是先试试身手，有了信心后再添行头。没想到这三根十年工龄的球杆，至今还立在车房里，不上球场在后院练习时仍常用。说是怀旧也好，更多的是用顺了手。

第二步的投资更小，是一本\$7.99的《Ultimate Golf Techniques》。这是本自学成材，图文并茂的大开面手册。从介绍当代的高尔夫名将开篇，然后列举整套木杆和铁杆的打击距离及球鞋，手套等备用品。接下去的篇章，洋洋洒洒地展示了站立，握杆，起势，转体，挥杆，收尾的详尽细节和各路窍门。全书以球场的设计理念和比赛的战术规则为终篇。

高尔夫球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每击一球，都是自我力量控制和心态平衡的组合运用。无论去练习场地，或是上正式球场，除了有亲朋好友预约在先，基本上不为他人的时间所限，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只要兴致上来，无论早晚晴雨，凉暖春秋，都能抽杆而起，尽兴即返。

年青时曾经认为高尔夫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它发源于乡村，演变为贵族富绅的嗜好。一边打球，一边谈天说地，是白领男性的养生之道，与寻常百姓似乎关系不

大。孰不见至今大师赛（Masters）的比赛场地Augusta National 仍然离经叛道，不见淑女的身影。然而高尔夫毕竟已引入二零一六年的奥运会而成为现代体育运动的佼佼者之一。

听一位在北京当副总的海归学友谈起，在海淀区打一场高尔夫差不多要花上千元人民币，还不算每年先交的可观的会员费。相比之下，敝舍所在的小镇会员费每年\$35，东，西两个球场，打十八个洞，平常人缴\$19，六十二岁以上只收\$12。相比较颇有天壤之别的感觉。想来这之间的差别，是否从一方面映证了中国走上坡，越来越豪华；而美国走下坡，越来越平实。

一开始练习挥杆，用的是“中国制”的塑料球。东飞西飘，上房的上房，过界的过界，毫无章法。倒是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黄花野草，蜂窝蚁穴。春天四、五月，用木杆打蒲公英（Dandelion）的黄花，瞄一打一，目标明确，弹无虚发。可千万别等黄花成了白绒球，那就真是满地鸡毛了。夏天六、七月，用铁杆打苜蓿三叶草（Clover），一挥一溜串褚白相间的小花落地，即使扫到绿叶子，也不用发愁，正好用来检查铁杆的运行轨迹。秋天八、九月，横行霸道的蟹草（Crab Grass）是用来架球的天然小丁（Pin），高的练木杆，低的练Fairway Metal，只管狠劲地打。如果运气好，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蟹草被连根拔起，一箭双雕，大快人心。

想当初刚起步时，邀着外甥一起练。两人总是以距离论英雄，打得越远，感觉越痛快。渐渐地由距离转向目标。所谓“党指向哪儿咱就打向哪儿”不是一个靠精神理解就能兑现的境界，而是一个勇于实践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击球的两个转身过程中，稍慢一拍，球飞向右侧，过快一拍，球飞向左侧。有点象插队落户时开山凿洞打炮眼。两手握锤柄，凌空砸下去，不偏不歪，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才能击中钢钎的顶端圆心，落石有声。挥高尔夫球杆时，特能体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贴切描述。

从开春至立冬，美国三大电视台CBS、NBC和ABC轮流转播大约四十场男、女高球锦标赛的战况。每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3点到6点总有好戏大戏上演。不是木头老虎输了，就是青涩女子赢了。最难理解的恐怕要数这些武林高手、杨门女将总是把果岭推杆软功列为高球十八般武艺的精髓。这叫做究竟工夫深不深，就看你最后

下接 34 页





# 上学的路

张人德 65 届

身为小学生和中学生，最最要紧的就是不能迟到。为了和心中懒惰的叛逆妥协，就选在最后一分钟离家。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幸好当年交通不堵塞，极少有突发事件，上学的路15分钟，可以严格控制。跟土八路一样靠着两条腿，十几年也走下来了。所以长年累月，同样时间同样路线，每天总能遇到许多“熟人”。就是脸面熟得不得了，可是真正一点不认识。

我两次离开上海多年，每次回去都会去走走同一条道，总会遇到几个面熟的路人。虽然岁月每次在脸上都添上了一层朦胧，巧遇的地点也变偶然了，“熟人”也越来越少，但总是能分辨出往日依稀的轮廓。

遇到“熟人”这种时间的精准可以在半分钟之内，几乎可以肯定在某个地标前正好遇到某位特别人士。近来和我的一位五年同窗钟元元闲聊，她每天从延庆路出发，应该和我是一路，可惜我鲜有记忆在路上邂逅她。可见我们在路上的时间正好相互平行，几年也交叉不了一次。平心而论，她比较勤劳每天比我早到，自然赶她不上。我们班级有一个同学住在五十一中学的隔壁弄堂“桃源村”，算是离学校最近的同学。可是每天他都是最后到，还有几次预备铃响了才翻墙过来。可是每天第一个到教室的同学却住在徐家汇，在我们当时的感觉里，那就是在上海的边缘了。可见距离非但产生美也产生勤劳。这是两个有趣例子。我认为我的15分钟步行是最佳距离，既让我不太懒惰又不让我太累。以现代的观念，正好达到每日健身功效。更有趣的是每天可以定点定时遇到一定的“熟人”，观察他们每天的变化。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一个每天早上迷迷糊糊头发不整的中学女生，一位梳洗整洁略有姿色的白领，一个骑着破单车迤迤而过的半老头，还有一位酷似我同学妈妈的中年妇女，都是60年代东湖路襄阳路的一块画布上的人物。早上的马伙计，一开在东湖路新乐路延庆路口的大饼油条店，热烘烘的糍饭豆浆伙着闹闹腾腾的刚买了菜的大妈们，汇成了散发在空气里的一种睁开眼、伸懒腰的早晨气氛。对过马路边一溜马桶不知是等着刷还是刷好了，绕着

走就好。南昌路口的菜场，虽是嘈杂，倒是从来没有想弯进去看看的欲望，如今想见也见不到了。一直到我读研，天天骑车经过南昌路，下午在路边的一家小吃店总要吃碗馄饨，当时没有什么恶意污染的担心，那个闲适惬意，一辈子都不再有了。都说物是人非，我们这个特殊时代，多的是人是物非。

到了中午，真的奢侈，还走回家吃午饭。班里寥寥几个同学能被羡慕骑车回家吃，大多同学只能发扬打绑腿的传统，接着走。襄阳路南昌路口的旧货店已搬出几架梳妆台类的旧家具在人行道上，让人非绕着走不可。东湖电影院就是每天能经过的开放花园。如果有一分钟富裕，可以钻进售票处看看星期天的儿童场有没有票。所有时髦的不再时髦的电影广告画都会准时贴在门前的广告大牌上，迟迟早早会被我们知道，不会被时尚拉下。上学去在天鹅阁门前，被浓郁的罗宋汤味一路送过淮海路；回家在襄阳路口人民银行处返回，老见到半开的铁闸门里贴着的储蓄宣传画。那时候银行的角色只知道是存钱的地方，那想得到现在会搞出金融风暴这么大的动静。两者之间的干果、水果杂货店裸裎着时令鲜果，夏天还在人行道上堆满西瓜，从平湖瓜、台种瓜一年年渐变为淮北瓜，十年如一日。隔壁还有一家小小的文具店，我的圆规、铅笔盒、钢笔、制图板，大多是从那儿买的。那时还有一项服务，买支钢笔文具店还管替你在笔壳上刻上一行字，使笔成为你独一无二的珍藏。

想想当年的日子真过得潇洒，上学的十五分钟步行街景，几乎就是少年的我的一个全部社会万象。现在在公司中午吃饭，也能磨磨蹭蹭一个小时，但是那个色彩单调想象无聊，每每让我怀念少年时赶饭吃的时光。

话说那位象极了我同学杨维德的母亲的中年妇女，每次我都差不多要向她致礼最后总是有些吃不准，因为她对我目不斜视的态度让我却步。我对杨说过多次他都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我们同行遇到那位妇女，杨维德大笑认可，当然还是说“有点不象”。母子之间那点事，这我就不好辨认了。我姐夫当时还没有候补，后来有机会对我

说，每天遇到先父去上班，都以为是赵丹。大概有几分神似吧。可见相像之人不在少数，小小一块东湖路就有几对拷贝。

父亲就在那家银行上班，每日也是目不斜视地阔步而去。我的小学校门就开在东湖路上。一次小孩子出去文娱演出，众人脸上涂得花花绿绿地在校门口集合，不巧时间老人把平行线交叉，正好被路过的父亲看到。当即训斥我举止轻佻形象不雅，让我心中杯具了好很久。想想现在父母烧着钱让孩子唱歌跳舞学琴涂画，老套的父亲怎么不开窍呢？时过境迁想想父亲还是不能与时俱进。杨维德的父亲就花大钱替儿子买不少布套木偶，让他和学校官办的木偶剧团（就是我）唱对台戏。父亲和父亲不一样，一声叹息，祝老人家们在天上安息。

真赵丹曾经住在南昌路上。经常早上看见他骑着一架破单车，带着他的招牌无檐帽，经襄阳路右拐去淮海路上班。当年也只有他敢戴那样的帽子。有时纳闷，当时怎么没有人让他签个名拍个合影？可见当年民风之淳朴，粉丝也不嚣张。不过也有例外。家姐有个闺友住在上海电影局对过面包房楼上，隔着淮海路正好是狙击手的最佳位置。女孩子正是情窦初开，追星情结最纠结时。出于矜持和奔放之中庸妥协，几位姐们有时就埋伏在闺友家里窗下，静候观察大明星们下班。那时电影演员普通劳动者，没有礼宾车自驾车黄包车，最多就是脚踏车。只要你用心看，一般一览无碍。所以常常看得心满意足、淋漓尽致回来。听说有一位痴情女天天等候孙道临，在电影局门前近身“肉搏”，犹如近来有卖家当追刘德华的那位。很让那些理性粉丝嗤之以鼻。不过自己当时太小，没有什么八卦兴趣，也没进一步打听下文。不知道为什么还记得如此真切，怪了。

住家附近云集了不少文人艺人，路上当然也能遇到。如果能够辨识，天天都有惊喜。程之在电影里是个獐头鼠目的猥琐角色，凡档次低的反面角色非他莫属。可是本人长得一表人才，一米八的个头，风度翩翩，与我们中学的陈少泽当年有得一比。不由得感叹，化妆术能使庸女变美女，也真能让俊男变窝囊。当然不能否认程之的演技是关键。所以美女们啊，化妆美容都是次要，演技很重要哦！

韩非个头不高，估计到不了一米七。可是自觉是个名人，人人都认识，所以一路走来不断点头哈腰客气万分，让你不得不频频鞠躬回礼。那一张笑脸至今我记得真切。最可逗的是小女满100天那次去上海展览馆楼上吃饭，在电梯里偶遇陈述。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准身材，一张标准的国民党面孔，满脸堆笑，不断地点头行礼，让人莞尔。想想现在的大款明星那不可一世的骄横，不由得潸然泪下。老克腊们啊，你们在哪里？

东湖路襄阳路一带就是当年浓缩了的上海市井生活，虽不是精华但也有代表。可惜自己年纪小小，对外面没有太多的注意，走在路上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班同学应利谷，一个爱恶作剧的好友，一天放学看我懵懵懂懂挤出教室回家，顺手就把手上提着的哑铃塞进我的书包。我只感到有些不同，也没去究竟，背去家里第二天又背回学校。利谷兄发现没达预期效果比较失望，只好启发我书包有没有不同。我疑惑地打开书包，哑铃赫然眼前！少年人少不得一阵打闹。现在两人提起还是大笑。我有时也纳闷，那路上15分钟当时想什么去了？不过也有顿悟的时候。记得当时看着路上的成年人，都觉得与自己苗条的同学们相比男男女女怎么那么难看？小学五年级某一日突然醒悟，原来他们也是从我们这么好看的少年变得那么难看的啊！茅塞顿开之后是沮丧还是庆幸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当时心智的飞跃倒是记得蛮清楚的。家姐大我几岁，我看她经常和同学在路上徘徊谈心，一谈几个小时不倦。她当时在团内当差，估计是在“帮助”别人进步。那柏油马路就权当了她的办公室。后来自己长大，也和同学在路上长谈。那个指点江山驰骋想象的豪迈劲，现在想起来恍若隔世。

我的小学在淮海路东湖路口，小时候从家慢慢走需要15分钟。少年时代走到复兴中路，步子大了快了，也就15分钟。读大学坐49路到枫林桥、骑自行车去岳阳路中科院上班，都是15分钟。想不到大学毕业一下子去了贵州，三天三夜的火车摇摇晃晃，方知中国之广大。现在的上下班，坐在车里非熬个把钟头不可，这个汽车的时代还真令人疲惫不堪。多么怀念那15分钟！我青少年的大部分回忆都凝固在那15分钟的路上。



# 老上海回忆：煤球炉

叶秋怡 66届

与攸承学弟聊天，提到美国能源部的一个开发课题——木屑砖：将木屑压制成砖状，燃烧取暖，可以代替燃油。目前研发的木屑砖成本太高，还不能作为民用，只是先在学校里试用。据说一个学校用木屑砖取暖，一年总共烧剩的灰烬，只有四个皮鞋盒的容量。

随之想到当年老上海市民的主要燃料：煤球。

煤球进入上海市民生活的时间不长。上海城市刚开埠时，只有在租界里才有煤气管道。其他地方的市民们都使用烧柴薪的大灶头，存放柴薪，占地不小。在上世纪20~30年代时期起，煤球制造商——“義泰興”向市民推销煤球。他们派人挨家挨户免费送上一包煤球，请市民试用。外婆跟我讲起，那天家里没人应门，来人就在那包煤球放在灶间门边上。等到佣人发现门外的小包，打开来，看到里面一个个桃子大小的黑黑圆球，不知是啥东西，以为是炸弹，大惊，后来才知道那是煤球。

煤球是无烟煤和泥土按一定比例混和压制而成。煤球炉占地不大，储存煤球所需的地方也较小，比起烧柴薪的大灶头来，更适应上海市民的生活。到上世纪40年代，煤球炉取代了烧柴薪的大灶头，进入上海平民的生活。除了有煤气供应的花园洋房那一小部分区域，大部分上海市民都烧煤球炉。

煤球炉虽然好使，生煤球炉可是个技术活：将煤球炉拎到弄堂里，废报纸，小木柴，破蒲扇，都是必不可少的。先点燃报纸，加上小木柴，搁上煤球，用破蒲扇使劲扇。常常是手忙脚乱，被烟熏得鼻涕眼泪直流，还是没能生旺煤球炉。有的人家有小烟囱，生炉子时放在煤球炉上，帮着拔烟，效率大大增加。我家的一位邻居曾骄傲地说，她只用一张报纸，就能生旺煤球炉，十分佩服。

其实，大多数上海人不会生煤炉。我家是大家庭，每天将煤炉封过夜，以免去每天生煤球炉的麻烦。封煤球炉也须要技术，将煤球灰调成浆状，糊在煤球炉头上，仅露出一个小孔，煤球炉就能维持一夜而不熄。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北方的蜂窝煤饼炉推广到上海，大大方便了煤炉的使用。（我记得1966年夏，红卫兵来抄家，把煤球箱彻底翻过来，煤球倒了一地，没能从中找到任何金银财宝。可见那时期，我们用的还是煤球炉。）等到使用蜂窝煤饼，封煤炉就容易多了，只须将煤饼炉底下的小门一关即可。在封过夜的炉子上炖一壶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可以用壶里热水洗脸刷牙，这在当时缺乏能源的生活中，

不无小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家房子紧缩，搬进来五家工人家庭，共用一个灶间。每天早上起来，壶里的热水早就给换上冷水了。

1987年夏，我留学德国两年后回国探亲，家中使用的依然是蜂窝煤炉，而且当时蜂窝煤饼还是按月配给，每月都得去买那配给的煤饼。更糟糕的是，月头和月尾买来的煤饼质量不一样，月初生产的煤饼里含的煤粉多，发火好，月底的煤饼里泥土多，发不出火。我们家是我二哥负责买煤饼，他事情多，常常都拖到月底才去买煤饼。我回家探亲时，不巧，家中又买到了发不出火的煤饼，饭菜在炉子上烧了半天都烧不熟，而且，一不小心，炉子就灭了，就得生炉子。一大家子十口人，每天都得弄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能吃上晚饭。

我在从德国回国探亲之前，朋友们告诫，不要多谈及政治的事。回家后，那个不发火的煤饼炉把我收拾得服服贴贴，天天小心地伺候那炉子，忙得投投转，哪里还有时间去闲谈政治。

1994年，在徐家汇弄堂里的老家房子给拆了，原先住在老房子里的亲人和邻居们都搬到了近郊梅陇，家里才有了煤气和卫生设备。再后来，偶尔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上海的垃圾已到了起燃点，可以焚烧了。这意味着上海的煤炉终于走进历史了。因为在普遍使用煤炉的年代，上海居民倾倒的垃圾中，很大部分是无法再燃烧的煤渣灰，当然不能达到起燃点。可以想象，这些无法焚烧的垃圾越积越多，对环境是个很大的威胁。只有在上海市民都告别了煤球炉，上海滩周围的几个大垃圾堆才终于消失了。



# 钟声记事

— 吉力立 66 届

试把记忆倒回到整整半个世纪前。法国梧桐夹道廊立的复兴路上：清晨，走进敞开的位育中学校门，扑面而来的是十几块一人高的黑板象整装肃立的礼兵迎接人们走进校园。工整齐刷的书写，生动活泼的排版，使我这个才被录取入校的中一学生流连止步。这，就是“钟声”。然而没有料到的是，“钟声”竟和我五年的位育学习生涯息息相连，并在几十年后依旧记忆犹新。去年九月在明尼苏达的校友聚会时，几位现任钟声报编辑要我写篇短文，记叙当年参与办报的经历。在我日益陈旧生锈的脑硬盘里，这段记忆已渐行渐远，再不搜索恐怕就将永远消失了。

钟声始于何年，要请更资深的校友来引证。我是在中二时作为预备抄写员被钟声招募的。当时的总编辑是任德铭，一位高三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且英年早逝。钟声二字据说就是出自他的首创，并成为日后所有刊头的楷模。当时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都以有机会为钟声报抄写为荣。但每星期三下午，当编辑把一张勾画整齐的手稿交到他们手中时，他们大都不明白也不屑知道这份壁报运转出版的详情。

据我所知，钟声每期十几版的内容，并无“上级”布置，基本上是由总编辑领导下的编委会决定并征稿。总编辑由校学生会指派，任德铭的继任是伍幼威（亦是北美校友）；伍幼威以后即由汤沐黎和我负责。宓执新后来也受团委指派参与编辑工作，与我们愉快共事。每个年级设一名钟声编委，每班设一名通讯员，大都由主动热心而又有文笔功底的同学担任。去年不幸早逝的67届校友覃雪芝和65届校友陈文乔都曾是编委成员。现在北美的校友朱凯靖，徐承一，肖亦麟，郑慧敏等，亦都是当时的干将。编委会议常在北楼侧自行车棚旁边的小屋里进行，但每周一期的出版，则完全是规律的运转。编委除了按总编辑的意图约稿写稿，也常常主动向通讯员们征稿。偶尔，校长或团委书记等学校领导也会按局势需要向编辑部发出指示，集中宣传报道某一方面的内容，比如学习雷锋，评审三好五好学生，等等。作为一个学生壁报，钟声的政治倾向在六四年以后渐趋明显。这时，编辑部常会写一些‘社论’，‘特写’之类文章刊登在头版或显著位置，宣传当时的中心任务。特别报道学校的‘风云人物’，如学生党员，团委和学生会主席，以及表彰优秀集体，先进事

迹，也常是注目标题。当然，同学们更加青睐的，则是那些切合实际，文笔犀利的短文。

编辑工作的重要部分是改稿。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切靠纸靠笔，在原作者的初稿上涂写勾略，以适应内容和版面需要。尽管编委们尽心尽力，但每周要确定十几版的内容，最后定稿还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汤沐黎家住襄阳公园对面的高塔公寓，我们周二常在他家工作到深夜，直到每份稿子都能被抄写员看懂为止。当然，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经常海阔天空地谈论些不着边际的话题，例如人类是否会进化成只有一个手指按电钮（汤氏科学假设）等，也是常事。这时，沐黎妈妈就会来关心询问，有时招待些点心，使我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夫人和剪辑前辈。而沐黎爸爸汤晓丹则深居简出，很少露面的。这些日子，我们两人结成的亲密友谊，让我们共同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直至今日未曾淡薄。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不知道粉笔是何物。但五十年前学校的一切宣传，从形式到效果，从吸引力到感染力，都要靠粉笔。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板书，美工。当年全校名列第一的抄写员非矫桂瑾（矫瑜老师的弟弟，也是北美校友）莫属。他的字体娟秀而有内力，颇见功底。覃雪芝的字工整奇特，独树一帜。现在能回忆起参与抄写的北美校友还有荣兆丰，如果我把那位遗漏了，在此致歉。沐黎和我也常常得临时上阵，聊以补缺，以我目前仍愧于见人的书法，真不知那时怎么敢露脸。但沐黎更重要的任务是排版，把色彩，动感，视觉冲击力带到这一字长蛇阵的十几块大小一般的黑板上。标题是用仿宋，隶书，草书；立体，斜体，还是用双勾，都由他决定。现在位育校友会刊上的‘钟声’二字，即是他的手笔。要用粉笔信手创作图画，须有很大才气。除了沐黎本人（当初即显露绘画天赋），中五（3）班的沈家驹是另一位高手。他的漫画生动诙谐，让人叫绝，总能吸引大群观众。我在位育的五年期间除了寒暑假，从未记得钟声有任何一周开个天窗，哪怕是一个版面。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钟声长廊就变成了大字报的世界。至于以后钟声是否恢复，何时恢复的，则必须由文革后毕业的位育校友来续写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这钟声将永久地回荡在耳边，萦绕在心中，永不消失。

# 自强不息 一忘却的记忆

矫桂瑾 66届

## 求学记

1963年，这是我和我们家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大哥矫桂琼从五十一中学高三毕业，在挑灯夜战大战高考。我大姐矫瑜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即将加入教师的大军。我也从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毕业，争取考入五十一中学。“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年，我妈妈特别紧张，生怕我大哥大学落榜，担心姐姐发配他乡，更恐怕我落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也许，这些都是我妈妈的过分担忧罢了。其实，她的子女们心中明白，他们的理想只能靠他们的自我奋斗来实现。

那年，我在拆开录取通知书时，紧张得手都微微地颤抖起来。当我看到被五十一中学录取了，心里一阵喜悦，轻轻地说：“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大哥那时是五十一中学的团委宣传委员，他写得一手好字，“钟声”报的头版总是他抄写的。他响应国家号召到内地去，第一志愿报考了西北工业大学，被光荣地录取了。他至今还在大学讲台上耕耘，并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曾任陕西省力学学会理事长。我大姐矫瑜凭着她大学全“5”分的优异成绩，被五十一中学挑中，来校担任物理老师，现已退休。当年，我们都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理想。我家的兄弟姐妹自此也与五十一中学结下了缘。

进了中学后，我分到了中一(8)班，受到了很多老师的特别关照，这当然与我姐姐有关。中一那一年，龚稚玉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我经常听到龚老师通过姐姐传给我的督促声。潘承芬老师是我们中一的数学老师。尽管我没有得到额外的补习，但潘老师在姐姐耳边敲的木鱼声自然传到了我那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自当“晦气”，只好多看书勤练习来补过。我们的体育老师黄楚九更期望我早些长高长大，跟姐姐“埋怨”说：“你弟弟为什么这么小？”那年，我真的很小，只有1米42。

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中二的数学老师张礼贤，以及同学们顽皮地模仿她带有无锡乡音讲解的平面几何定理。我挺喜欢平面几何，所以成绩还可以。中二年级，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学里最“混”的年级。不像一年级新生，老实地循规蹈矩。也不像中三学生，刻苦学习，准备迎接高中的入学考试。所以，不知怎么，中二一下就那么“混”过来了，进入了中三。我们中三的班主任是谢志民老师，

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的英文也许是谢老师教会的。他那时教我们的自然拼音法，是我文革后重新拾起英语的最重要的工具，至今不忘。

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什么，老师安排我要“帮助”姚方方，我们坐在一张课桌上，还在最后一排。可是，我记得我们桌子上是划线的，并且约定互不侵犯，谈何帮助。在革命组织的关怀下，中三上学期，我入团了。10月20日是入团那天的纪念日，与我下农场同一天，至今还记得。从此，我的介绍人李晓苏成了我的好朋友，几十年一贯如此。特别值得提到是我们班在五十一中学女子排球队有两名队员，而我们女排可厉害了，打过上海市中学冠军。这两名队员是姚方方和许蕴中。许蕴中给我的印象可深了，我觉得她漂亮迷人，就像我心中的小天鹅似的。每次她们打球训练，都要去凑热闹，其实就想多看她几眼。可惜文革把一切都打碎了，大家各奔东西，杳无音信，一分就是三-四十年。青春的记忆是永恒的，难怪35年后，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

## 疯狂的文革

最难忘却的五十一中学岁月发生在文革中。在那风风火火，上下沸腾，人鬼颠倒的年代，16-7岁的青少年都被卷入了这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没人能够幸免。1966年6月初，我和大家一样加入了上街“扫四旧”活动。那时，淮海路，南京路，西藏路，福州路都沸腾了。女士们光着脚在马路上行走，只因她们的皮鞋太尖。她们的“资产阶级的尖头皮鞋”在路上当场被剪了。我亲眼目睹了在西藏路汉口路口上的，和平电影院对过基督教慕尔堂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正从教堂顶上吊下来，被打翻在地了。现在想来，当时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知道也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整个社会那时似乎充满了一种“红色”恐怖。

学校是文革的重灾区。我们都投入了“口诛笔伐”写大字报的行列。学校停课了，高考取消了，文革运动正一步一步地“深入”进行。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学校里到处可见。尽管听说我班有同学去抄了自己班同学的家，直到1966年7月，大多数同学之间关系还是融洽的，还未到分裂的程度。我们班不像有些班，我班少有高干子弟，处长级也许是最高位了，班里也没有分裂的红卫兵派别。到8月份，在红卫兵点燃了大串联的火后，我们班里的六七个男同学也一同上了大串联征途。

我已经不记得几月几号上的路，也不记得所有同学名字了。这是66年的盛夏，我和我们中三(8)班一些男同学参加了上北京的大串联。那时，火车不能上了，上海安亭火车站堵了。我们借道公路，坐汽车到了青浦县城。下车

后，我们这群人步行到了朱家角镇，看到了淀山湖。在湖边，我们和湖上的船民聊上了。可巧，船是开往苏州去的。在船民的邀请下，我们搭上了船。那是小火轮拖着的一系列载货的驳船，我们分头下到不同的驳船上。在船上，船民盛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吃在船上，睡在船上，至今我还似乎闻到木船上散发出的新鲜的桐油香味。船大概走了十几个小时，我们是下午4-5点上的船，第二天清晨到了苏州。我们赶到苏州火车站，挤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货架上躺着人，地上也坐满了人，而车厢顶上无力的风扇怎样也无法挡住人挤人散发出的那股汗臭味。我记得我还是爬出窗外去解手的。这趟火车到了南京，已是中午了。当时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直达火车都要上摆渡船，而南京是我们那趟车的终点站。下了火车，我们直奔长江轮渡。登上轮渡，望着涛涛长江水，我感到长江特别大特别宽阔。一到浦口，就听到北京红卫兵在浦口火车站检查登火车的学生，要大家自报成分。那个时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刚刚开始。带着宽宽红卫兵袖章的北京红卫兵把守着上火车的通道，给人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

去之前，我们都没有因为家庭出身成分而分裂，因为“出身论”在同学间还不流行。但在浦口，裂痕开始出现了，同学之间开始互相揭发了。红五类的同学首先要求出身不好的离开。有同学还当面叫“反革命”，示意我的家庭出身。我记得在浦口除了红五类同学外，其他同学都迷途知返，没敢冒险闯北京红卫兵在浦口火车站拦截的大门。我不记得多少同学上了火车，多少同学回了上海。我一个人回到了南京，晃荡到南京大学，挤在人群里看到匡亚民被“揪”出来了。觉得无聊，我就坐火车回上海了。后来听说还有几个同学也回了。

这大概是我班同学间分裂的开始吧。我记得1966年秋天，我们班到上海县帮助秋收。一天晚上，夜很黑很黑。不知谁组织开会，我班同学集中在打谷场上。我也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我说了什么话，一帮人围着打我。有个同学打得最凶，第一个冲上来把我推倒在地，压在我身上。据同学回忆，有人还拿着手电筒，往我身上猛砸。当时有人还撕破了我的衣服，好几个同学旁边还打了一些冷拳。后来，另一些同学冲上来把我解救出来。我还记得1967年的冬天，有个同学穿着黄军大衣，戴着黄军帽还缀有红星，到我家门口，大呼什么“反革官”之类，并且还带有威胁之词。当时我在家，我姐夫也在，我父亲也在。我们没有言语，屋里静悄悄的，都静听着那个大声的叫喊。我那时心里冰凉，有一种恐惧的感觉。那天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作为班里最大的“狗崽子”，得到这种待遇也是

无可非议的。

文革中同学分裂的现象在五十一中学很多班级同学间存在，这种鸿沟如同深渊，至今都是无法弥合，可见其创伤之深刻，想淡化是淡化不了的。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诅咒过去，也不是对过去的耿耿于怀，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在灵魂上得以解脱。我对同学讲16-7岁的青少年在疯狂的年代可以干出疯狂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那个思想腐蚀了我们年幼的心灵，而这些同学其实都成了被人使唤的工具。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让伤口愈合，让我们的后代知道在我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段令人悲哀的过去。这过去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的写照。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过失，而是一种主义的回光反照。回顾是为了展望未来，并给历史写个句号。如有幸我班同学还能团聚，能不论这派那派，能结束四五十年的对立和冤冤恨恨。我愿为大家当座桥梁，用我的双手连接这过去的两极，以化干戈为玉帛。

### 我的父亲

时间一过，都是历史。而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历史的误会产生于对历史的无知。因为我姐姐矫瑜任教中三，又为大队辅导员，对于我家的出身，同学中多有指点。不仅我们八班同学有传播，其他班的同学中都有所闻，并以讹传讹。

文革前，我们的成分来自于我姐姐上海师范学院领导对我姐姐的特殊关照，给了她一个“旧官吏”的出身头衔。当年有了这个出身成分，是很抬不起头的。现在查来，我父亲在国民党外交部的职位确实是中华民国公务员制度四级官吏中的荐任官阶，实为官吏。姐姐在市二女中就是高材生，又是上海市少年女子篮球队队员。上海市少年女子篮球队在1959年获得全国少年女子篮球锦标赛的冠军，她至今还保留着那块金牌。由于我父亲的要求，她去了上海师范学院，因为师范能提供生活费。她是师院篮球队主力，虽然缺课很多，但考试全拿“5”分，成绩出众。对她来说“德智体”就差“德”了。好在父亲历史并不复杂，当时政策比较宽容，她有幸入了团。以后，我们三兄弟都在文革前入了团，除了年龄太小的妹妹。可是，我妹妹在文革中始终没能入团，尽管她原来还是市二女中的大队长。

我这个出身在文革时显然在“反革命”行列，同学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反革命”家庭。这里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我这个“反革命”父亲吧。

我父亲是一个旅居日本十几年的爱国华侨，从来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他在日本上的大学，有一个令人羡慕的

职业，多年在法国驻日本神户总领事馆工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他参加了抗战时的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相当于黄埔十四期。他和许多留日同学不光是放弃了“国外高薪”，而是投笔从戎了。他们当年没有所谓“放弃国外高薪”的桂冠，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媒体的大肆追捧，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叫“抗日”。我们曾经问过父亲：“当年你回国干什么？”他的唯一回答只有两字：“抗日”。

训练班毕业后，父亲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委员，他是四名中方委员之一，韩方委员也是四名。指导委员会主任是黄埔一期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中将。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是直属政治部领导的韩国抗日独立武装。朝鲜义勇队是一个左翼抗日军事组织，父亲还在朝鲜义勇队里兼任指导员。下面是朝鲜义勇队1938年创建时的纪念照（图一）。前排在队旗中间的是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金元凤将军，黄埔四期，韩国著名的独立革命家。我父亲站在第二排右一。我父亲的多位韩国同事都被韩国政府授予了“独立勋章”。多本史书上都有着这个组织和我父亲为她服务的历史记载，甚至有论文提到父亲当年发表的文章，以示他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贡献。

父亲在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解散后，受雇于外交部抗战时最重要的情报司，后被任命为驻苏联远东的随习领

事。当年他没有随国民党外交部移居广州，留在了上海。1949年初，他和他的最好同学（曾是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专门讨论走留问题。我父亲认为他是技术官员，精通俄语，日语和法语，国家可以用，决定留下来。他的朋友也认为他是搞技术的，他也留下了。一留结果都留成了千古恨。留下来以后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的“反革命”。

###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作为“反革命”的子女，在那个年代要想“自我革命”都有困难。1968年，在分配时，我想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去“彻底改造”自己，可是这个愿望只能是我的胡思乱想。当年，凡带个“军”字的政审是很严格的，而我这个家庭成分显然是不能沾上边的。那时，我们学校有一批“革命”坚定分子，自愿要到井冈山根据地插队落户去，我班的任远就是好样地到那去了。那批同学多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我显然也不属于那个行列。我班同学除了到工矿的，其余多数都去了崇明东风农场，可我一人挑选了“不太艰苦”的崇明前哨农场，从此同学们就奔向四面八方了。

尽管离开了学校，五十一中学同学还是到处可见。到了前哨农场后，农场正在组建所谓的“钢二连”，我报名去了钢二连。在那里我结识了五十一中学中三(4)班的金鸿森(已故)，安扬，黄小牛，还有中三(6)班的钱寅杰。我至今记得，1968年底我们围海造田，赤脚踩在结冰的污泥里挑大堤，气温降达零下。回家的路要走一小时，可我的鞋已硬如冰块，无法穿了。我赤着脚在结冰的路上跑到临近

的五大队，向中三(5)班的盛擎光同学借了一双解放鞋，才得以走向连队。在69年的元旦除夕，我们挑大堤挑到银装素裹，回到家满地已是雪白一片了。我们钻进了由芦苇扎搭的滚地龙的家，外面飘着大雪里面却下着小雪。我们这群初生牛犊望着还未封顶的砖瓦房宿舍，目睹着我们住的半圆形漏风的滚地龙，似乎感到“革命重担”在身，默默地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农场的元旦。

在农场，我忘我地拼命苦干，虽长了一身肌肉，但丢了方向和目标。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天真而盲目地追求



图一：陈列于韩国独立纪念馆和上海，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的照片



美好的“革命理想”，以为无限的奉献可以换来政治上的平等对待。可是，这些只不过是幼稚青年的好高骛远，革命组织的回答是“你要接受生死考验”。听话听音，尽管你使出了超乎常人的能量，但这还不够，也许死也不足以证明你的忠诚。那个年代，人是有三六九等的，而更何况我是个带有形容词的，有标点符号的另类了。好在有一群“狐群狗党”，他们并不在乎我的出身是三教九流还是帝王将相，这群狐群狗党后来都成了我的莫逆之交。

当梦想化为烟雾后，想上调就成了改进处境的机会了。好在表现好，1973年我顺利地地上调到上港五区当上了扛大包的码头工人。我还是那样苦苦地漫无目标地追求着，以为太阳总有一天会照到我身上的。码头装卸工繁重的体力劳动，既肮脏又非常危险。没有防护眼镜，生铁渣掉下弹跳到我眼边，就差那么几毫米，给我的左眼角上留下了那块永久的伤疤。当年，如果失去了我的那只左眼，也许只会得到一些怜悯。农场上调的同事中，有人被棉花包砸死，年青青的也就成了一缕青烟。在那个年代的革命宣传下，培养了一大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也包括了我。可是这种奴化般地追求，并没让阳光照到我上。尽管我很早就荣幸地享有个青年支书的头衔，可是后来很多我的部下却都成了我向他们汇报的上级，包括那些我发展的青年们。我看着这些人提干的提干，入党的入党，升学的升学。而我呢，带着那个永久的烙印，还在娘胎里就形成的胎记，还在傻傻地渴望有一天能用无穷的汗水把这个烙印洗刷掉。我依然是那么个默默无闻的装卸工，朝六晚七，出卖着苦力。年龄一年年增长，希望一天天渺小。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这无底的，黑洞洞的人生通道。在5年当码头工的光阴里，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只是留下了一身病痛和无限的悔恨。

1977年，当高考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时，我却成了数盲。在1977年的初考时，我数学考了个大鸭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把数学全交还给了五十一中学的老师了。当曙光出现时，我却没有了应对的功夫和能力，这不能说这不是我们这一代巨大的悲剧。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班多数同学都应该是大学生了。当时，很多我认识的五十一中学的初中同学，在1978年春节前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成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这个消息给我的刺激太大了，但这个刺激也给了我无限的动力。我暗自下了决心，“他们能进大学，我也能进”。在1978年春节后，我参加了五十一中学的高考补习班，开始恶补数理化了。还是那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经过文革的洗礼，我进一步体会到这条至理名言的真谛了。

数学我从通分约分开始补起，我还拜了蔡光天为师。

在5个月里，我做完一万四千道数学题，从初一的到高三的，一题都不拉。我姐姐姐夫教我物理，从压强补到电磁场。化学我从元素周期表背到反应方程。当时，我们上港五区认识我的人，没有人认为我能考上大学。蔡光天老师也对我表示担忧，因为我要在5个月里补回六年的中学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发榜时，在1978年上海秋季十万人的高考大军中，我成了第一批录取的一万名之一。那年扩大招生，放低分数线，都是后事了。可惜，大意失荆州。体检查出我心脏早搏，这是繁重体力劳动带给我的。我没有提前把我单位的病历卡抽走，结果成了我落榜的证据。一失足成了滑铁卢，也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1978年的秋天是个漫长的秋天。我心灰意冷，不知我还能走到哪里。有一天，我到好朋友中三(4)班安扬家去，安扬那时已进了同济大学。我灰溜溜地谈到了高考落榜事，他哥哥安久(五十一中学中五的，复旦的)旁边听到了说：“知识总归有用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它重新点燃了我。从此，我拿起了丢了十几年的英语，又学了高等数学。1980年初，我考入了上海业余工业大学第一届机械系本科班。一面干着电焊工，一面念大学。这些先修和自学的课程都通过了免修考试，使我有幸学了一些不在学位要求里面的其他专业课程，为我后来发表论文奠定了基础。

1985年初，我大学毕业了。我终于可以从工人编制不需要有人提携，合法地转入干部编制了，我从此从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了。这真是伟大而漫长的革命转变，抗战只打了8年，它却经历了十七年的磨炼。我不清楚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八年。尽管八十年代中期是政治上最开放的年代，那时单位里出身成分是不再讲了，但迂腐的官腔可以让你窒息。学机械的，不能干设计，原因是你的学历比科长们高。我失望了，我不知道我今后的道路在哪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的。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渺小到无能为力。也许出国还能给我一线希望，因为它是唯一可以通过自我奋斗来实现的。惹不起，总还躲得起。最终，我踏上留学的道路，并在那里找到了自我，尊严，希望和归宿。

### 留学准备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我三十才进大学，三十五准备又考G又考托，四十赶赴洋插队，四十五还去攻什么“博”，快到知天命年了，才刚安家“立”业。我五十而立，虽然晚了二十年，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没有给五十一中学抹黑。我尽力了。

考G考托是在蔡光天老师办的前进业余进修学院准备

的。外国语言学习的年龄应该是越小越好，可我是超高龄了。那种不可逾越的障碍是非常明显的。我不知道哪年哪月托福能够考过550分。那时，尽管当机械工程师没了希望，好在单位给了我一个闲差—当职工学校老师。这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使我有充分的时间来作考G考托的准备。为了提高听力，英语九百句成了我的伴侣。我不仅听，而且一句一句鹦鹉学舌地跟着朗朗大声地念，以形成条件反射。用英语来思维是过英语关的关键。

在担当这个职校老师的几年中，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我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不仅在二年一度的“材料磨损”国际年会上发表了，过了几个月磨损领域里最高级别的杂志《磨损》(WEAR)上也发表了。在这篇论文里，我推演的机械零件磨损方程成了美国出版的《摩擦学数据手册》(1997版)收入的二十一个磨损方程之一，而且它是唯一由中国人推导的磨损方程。第二，托福我考过了550分，也考了GRE，并被美国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Louisiana Tech University)录取为研究生。

无巧不成书。我是1989年感恩节过后一天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我在美领馆门口遇到了二十多年未见面的，我们五十一中学同班的鲍家明同学。我的签证官是人人皆恨的“黄毛”。我一见他，我就把所有材料厚厚的一叠，全部一次性地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我，然后把最上面的一式二份的表格订在了一起。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已经通过签证了，因为拒签的要退一份给申请人。他只看了我的I-20，其他什么都没看。签证过程中，他还离开与人聊天。他要我用英语回答问题，好在900句帮了大忙。他看了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教授邀请我大学老师和我共赴年会的邀请信，还看了GRE，然后就说过两星期来拿签证。当我说学校也已经快开学了，结果他破例了，只要我一星期后去拿签证。看来，“黄毛”并非大家认为的那么“坏”。这天鲍家明同学也签出了。

事件发展得太快。恐怕夜长梦多，我是说走就走了。我拿到签证后，过了四天就离开了养育我的祖国。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只有麻木，只有悲伤。母亲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她，我望着母亲沉默了，无言以对，不知应该如何作答。在短短四天里，我大学的老师们来送我了，包括原来大学的副校长。中三(8)班同学李晓苏和吴鸿来送我了。农场朋友们也来送行了。1989年12月6日那天，五十一中学的蔡光天老师到我家门口来送我，他送了我一根红色领带还有一支金色的别针。他还送了我一张他的签过名的照片。这些礼物至今我还保存着。柯从绳老师也来了，他还送我到虹桥机场。我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奈，我离别了和我一起生活的妈妈，也离别了祖国。

## 洋插队

到了美国，我学会了生存。念书要学费，赚钱就是为了生存。美国少有贵贱之分，我的第一份工是中餐馆洗碗的。这家帽(mall)里的餐馆生意非常好，在里面干活的人在中国都可以评为劳动模范。如果不是为攒学费，两天下来可能就辞了。结果，我干了两个多月，直到学校开学。

春季开学了，系里多数没钱赞助学生。我的导师挺帮忙的，他给了我一个学生助手的工作，它们通常只给美国大学生的。可是这钱只能当零花钱，不包学费。因为听到一位上海来的女同学没有考出托福，还在数学系拿助教(TA)奖学金，我就去闯了数学系。幸运的很，系主任和系秘书正在讨论一个助教的空缺。我毛遂自荐，并把780分的GRE数学成绩递上了，结果我这个机械系的研究生却拿到了数学系的助教奖学金，总共拿了一年半时间。这笔奖学金帮助我度过了留学初期的经济难关。看来这里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看你如何抓住机遇去寻求了。这个经历证明人只要努力，机遇是均等的。不要烧香拜佛，不用看人眼色，不用卑躬屈膝，我的能力就是我。这件事使我真正地感到了自我，感到活着像个站直的人，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受到和享受过的感觉。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电阻焊点焊控制技术的。我的论文只和导师讨论了个题目，老师不问我，我也不问老师，花了8-9个月自行完成的。论文有120页，比通常的硕士论文长了2-3倍，当然很容易地过了关，并得到了好评。在写论文时，我自然地形成了一些主意和想法。因为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的博士是绝对不想拿了，在找工的同时，我写了信到一些有名的大学教授那里探索进一步深造的可能。我和一位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谈论了这事，他以一个中国人的目光和偏见说“他们不会回信的”，结果与他的武断完全相反。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大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亲自回了我的信，对我感兴趣的领域表示目前没有资金。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美国焊接协会的主席把信转给系主任，而系主任的回信是满页的。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简称RPI)的教授，两学会院士，就是我后来的导师，回我的信更是满满两页，连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机械系主任看了都吃惊。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信件。美国教授们求贤若渴的精神，体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大将风度。这些大教授只要他们看到了你对那个领域的理解和潜力，他们是一定会回信的，而不会因为你是无名小卒。这就是你能在这里感到自我，并体会到人的尊严。

我硕士毕业时的1992年，正值当时美国衰退最严重的

时光，全国的失业率7.9%，但我还是毕业了，走出了校门。我一面打工求生存，一面找工。其实，那年头报纸上就没有招机械工程师的。打工到处都打，我送过比萨馅饼和中餐的外卖，送过汽车零件，还当过汽车修理工。最后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食品厂当上了修理工。可以说，我干得昏天黑地，拿着却比最低工资还低的工资，但这一切我都忍了。这个期间，我学会了修理汽车，修理机器，电器和机械问题通吃。我从汽车店老板那里默默地看会了修汽车的窍门，融会贯通到怎样查寻复杂的包装机器的机械和电器故障，另外我把大学里学习的机床电器控制全部回忆起来了。因此，我留给了中国食品厂老板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我会修机器。

我在这段打工期间，没有停止努力。根据我写硕士论文形成的主意，我写了一个可行性报告，寄给了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作为申请美国焊接协会奖学金(Fellowship)的申请书。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焊接专业曾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历任美国焊接协会的多名主席都是她的校友。她的工程学院研究生部在1993年全美排名第13名。伦斯勒理工学院教授看了我的报告后，马上作了文字修改。在他收信后的第二天，打了电话给我，表示愿作为我的导师把这份申请书送给美国焊接协会。可惜，好事多磨。1993那年，美国焊接协会没有给我这份奖学金，教授后来告诉我，问题出在他的推荐信上，协会认为学校还没录取。1994年，重新申请时说学校保证录取，只差奖学金。结果在1994年，我获得了美国焊接协会奖学金，成为全美国六名获奖人之一。当年三份美国技术杂志上刊登了这条授奖人名单的消息，美国焊接协会基金会具体刊登了获奖人名单和他们的研究课题(见图二)，甚至还出版了带有个人彩色照片的宣传小册子。

我，一个毕业于中国名不见经传的，没人瞧得起的“野鸡”大学，拿了美国四类大学的硕士，却被美国的一类大学，美国最古老的工程学院，世界上最著名的焊接专业录取，还获得了美国国家级的奖学金，使我感慨万分。我不能想象在一个急功近利，连清华的博士都要查三代的社会里这种事可能发生。我的一切努力在那里也许碰得都是头破血流，一切只能是天方夜谭。但是，在这里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发生得那样的真实。这里没有固有的偏见，只靠真才实学。这里不看你是贵族还是庶民，你的能力得到一视同仁。这就是我渴望的人的尊严。

人是有命的。1994年8月在我整整45岁那年，从美国南部的休斯顿开车3700公里北上到纽约州去攻“博”了。好景不长，半年后，中国食品厂老板打电话要我回去当他的厂工程师(Plant Engineer)。我权宜了一下，觉

得人生不能永远在学校里度过，读书的目的就是能干你想干的事。尽管我当年的年奖学金超过\$35,000，但除去学费也就所剩无几了。柴米油盐永远是人的第一需求，工作经验也许比学历更为重要。为了家庭和孩子，我放弃了这个荣誉，放弃了博士桂冠，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自己感觉有愧于我的导师，而女儿还说父亲没有意志。我哑口无言了，不知如何向她解释。

如果，我早十年大学毕业，念完这个博士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我早一年拿到这份奖学金，中国老板也就不知道我会修机器而要我回去了，我也许在天命年时戴上了博士帽了。如果那个由名大学教授们组成的美国摩擦润滑工程学会代表团，包括邀请我参加年会的密西根大学教授Ludema，到了台湾，到了香港，要不是因为“六S”也按计划到了上海，命运也许完全不同了，也许90年代中期我的博士帽就戴上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下乡，如果我有一个普通的爸爸，如果78年我就进了大学……..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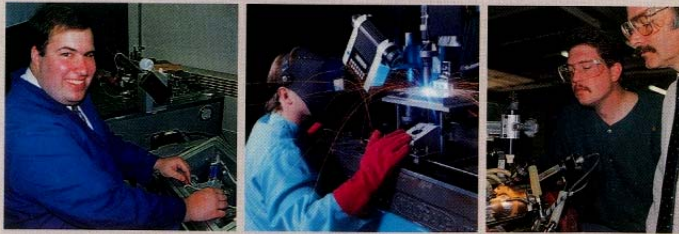
Each year the AWS Foundation awards graduate fellowships to students attending a welding science or engineering related program. A fellowship award consists of \$20,000 which is matched in-kind by th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where the student is engaged in post-graduate work.


## 1994-95 Fellowship Recipients

*The students who will receive awards granted this year through the AWS Foundation are:*

<p><b>Glenn J. Gibson Fellowship</b> Matthew Q. Johnson ...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Shielded Metal Arc Welding Consumables"</p> <p><b>Miller Electric Fellowship</b> Heather E. Beardsley ... University of Kentucky "Three 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the Weld Pool Geometry for Adaptive Control of Weld Penetration in GTAW"</p> <p><b>AWS Fellowship</b> Thomas J. Lienert ...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A Fundamental Study of the Joining of High-Temperature Discontinuously Reinforced AL-Fe-Si-V Alloys"</p>	<p><b>AWS Fellowship</b> Scott A. Martin ... Clarkson University "Weldability of Materials in Microgravity Environment"</p> <p><b>AWS Fellowship</b> Guijin Jiao ...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Development of a Graphite-Fiber Reinforced Copper-Alloy Composite Electrode for Resistance Spot Welding"</p> <p><b>AWS Fellowship</b> Robert A. Santarossa ... University of Alberta "The Mechanism and Mitigation of Ductility-Dip Cracking"</p>
---	--

*The mission of the AWS Found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welding and related joining technolog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Foundation, Inc.**  
 550 N.W. LeJeune Road, Miami, Florida 33126  
 (305) 445-6628

图二：1994年8月号，<<焊接杂志>>(Welding Journal)插图

很多很多“如果”，但我是命该如此。从此，我干上了工程师的活，拿上了工程师的工资了。我想当年我念那个大学不就是希望能当个工程师，而当不成吗，而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以后，我还在美国最大的卡夫(Kraft)食品公司当了几年工程师。现在我为美国最大的屋顶材料公司已经服务了十几年了。10年前，我在这家公司就“popular”了，因为我解决了公司4-5年都没有解决的，西门子设备的技术问题。我现在是最高资格的工程师，我有一个美国发明专利，还是唯一的发明人。两年前，一家美国大公司要雇我，给我年薪加一万，我都不为所动。我不求上进，只求安宁。因为我们生产线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因此技术难题也是世界级的。几年前，当我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后，我的老美同事问我：“为什么你们国家要让你出来？(Why did your country let you go?)”我不知如何作答，我失语了。我是炎黄子孙，我身上脉动着我的父亲的血液。

历史把我推到这里是有因缘的。我到这里是为了追求人的自身价值。在这里我发现了人的价值，感触到了自我，体会到了尊严，看到了希望，也找到了归宿。我的道路坎坎坷坷，从刚到美国仅有的几百美元，到进入这里的有产阶级，不用靠依附特殊阶层，只靠自己努力奋斗和真才实学，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宽阔胸怀。我心情舒畅，问心无愧。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但我非常心满意足。这里我身体健康，高考时的

上接23页， **高尔夫**

进洞不进洞。

俗话说“看人挑担不吃力”。如果拿打乒乓球做个比较，推、拉、抽、吊、挡，缺一不可；打高尔夫球，切(Cut)、划(Draw)、挑、扫、割，五味俱全。每一杆或使人雀跃泣喜，又常遭灭顶之灾。雪白的小球时而鹰击长空，时而鱼翔湖底。上果岭，入沙坑，陷草丛，落泥塘，真叫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对咱搞业余的来说，抓小鸟(Birdie)算奇迹，打平杆(Par)是荣耀，平杆加一(Bogie)符合标准，平杆加二(Double)也不出丑。按照十八个洞，七十二平杆计算，打入八十杆内定称英雄，打入九十杆内就是好汉，即使过百大关也至多是个随大流。可千万不要半途而废，那会给人笑柄。

小时候初学毛笔字，家长们交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土法上马后半年，丑媳妇要见公婆了。买一套“金熊”牌(Jack Nicholas)国产球杆，加上税总共才花了\$120。三根木杆，一号、三号、五号，管两百二十

脏早搏，到了这里后再也没有检查出过一次。我不需要溜须拍马，不要上贡奉献，不谈裙带关系，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公司赚钱。你的成绩没人不见，你的贡献加薪来体现。在寻找人生归宿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林语堂”

## 结束语

如果没有同学的鼓励，也许永远没有这篇往事的回忆。这个回忆让我能缅怀母校对我的孕育，能回顾师生和同学间的情谊，并能展示历史和偏见。我的回忆记载了一个五十一中学的学子如何自强不息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可能只有我们同一代人才能理解。我的回忆反映了两代人的遭遇，追溯了历史的沉浮，铭刻着社会的深深印记。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淡出的过去都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演变，而留给我们后代只是几页文字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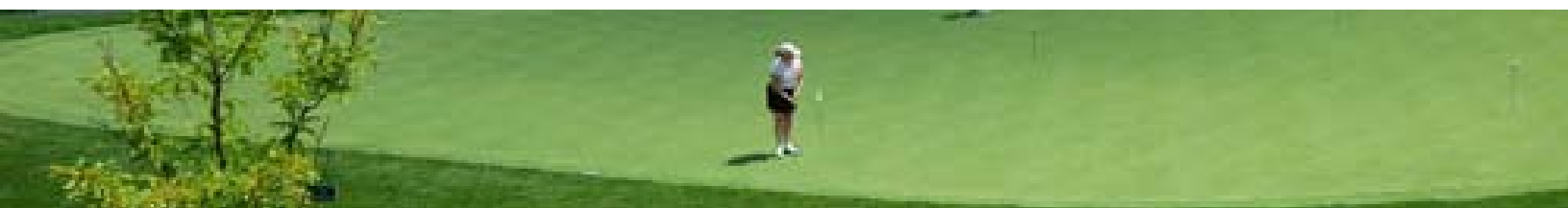
至少我还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末班车。设想很多类似于我这样的同龄人，不是因为他们愚笨和不努力，而是这个社会使他们成了迷茫和失落的一代。没有人愿意回顾已经忘了的过去，因为这些过去留给人的是失望和遗憾。我们失去的是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是一个热情奔放，想入非非，卿卿我我，大胆追求，憧憬五彩缤纷未来的时光。失去的岁月永远不能回返，但愿这个拾回的记忆能够填补四十年丢失的那片空白。



米，两百米和一百八十米。八根铁杆，从三号到九号，外加Pitching Wedge，涵盖大约九十米到一百六十米的草场。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鱼则清。打高尔夫，球不在远，有准则灵。信不信由你。

谈点题外话，还是在五十一中留下的大约二百度的近视，这五年来开始与时俱进地综合着缓步而来的远视。经过一千多天的远近磨合，现今上球场时，除了一顶遮阳帽，已经无需配戴近视镜，老花镜，或是时尚的双光镜，有一副平光墨镜就对付了。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有趣的里程碑，殊不知当你的视线不能顺利的跟随那小白衣天使漫天飞翔时，心里就会滋生一种怅惘的失落感。

耳顺之年的养生之道应该是以平和、温顺、协调为主，且应经久不息。打高尔夫球，练挥杆，靠的是手与脚的配合，练推杆，则是脑与眼的协调，加上平稳的心态。更多的时间会花费在那六千米至八千米的绿茵漫步上。用我女儿的话说，这叫化点小钱，受点小罪。但愿长此以往，益寿延年。



# 老覃走了

俞沐民 67届

覃雪芝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那时候，我们都称他老覃。相识至今，我们叫了他四十多年的老覃。

覃雪芝是我的同学，战友，兄弟。

在中学里，老覃是个言语不多，但思想深刻的人。他说出来的话是经过对一个问题深入思考，然后对最后结论的描述，并且语言非常简洁。所以，一般同学往往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再加上他的形象是：走路弯腰踱方步，说话微笑，轻声细气，大家都称他为“老夫子”，说出来的话是“文言文”，听不懂，则取笑他。而我则自以为理解力强，能够领会老覃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经常在同学笑话他时，为他做翻译。而每当我为老覃解说之后，他总是抿着嘴，轻声笑着：“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一个人称老夫子的文弱书生，面对多年来一次又一次恶疾的侵犯，表现得无人可比的坚强。他的一位台湾同事感慨地说：“我在台湾当过兵，但是覃先生这种与疾病抗争的惊人意志，部队里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的确，老覃与癌症的顽强搏斗，创造了医生们声称的奇迹。

在上海时，我家离老覃家很近，我常去他家。老覃家有一间小屋，这是老覃的小屋，小屋虽小，但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间小屋是老覃的深爱。记得我经常去老覃的小屋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的。老覃是我们红旗公社风雷战斗小组的核心人物，老覃的小屋则是我们小组的聚集地点。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少年经常聚在老覃的小屋里通宵达旦地激发我们青少年时期的那股激情。回想起来，至今难以忘怀。

高中毕业分配时，老覃被分配到崇明农场，但是他为了更深刻地体验农村的生活，自愿要求到江西山区去插队落户。在那艰苦的山区环境中，体弱的老覃患了肝炎，回上海来休养。我就常常去老覃家看望他。每次去，他妈妈总是大声嚷嚷：“俞沐民，你快去劝劝覃雪芝，你看他捧着一本书，从早到晚，呆在小屋里不出去。怎么劝他也不听。”在那种百业荒废的年代，老覃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刻苦自学，所以文革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研究院，然后考上出国留学，来到了美国。

老覃一直是一个志向远大，并且刻苦努力去实现自己目标的人。他在Merck工作是取得的好几项新药研制成功的优秀成就。他曾经对我说，要争取拿诺贝尔奖。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的。但是多年前在办公室因脑瘤出血摔到之后，他被开刀治疗，在家休养。我就对他说，现在你不能去拼搏诺贝尔奖了，干脆退休，在家写书，小说啊，科研书啊，都可以。我知道他当年在小屋养病时已着手写小说了。但是结果，脑瘤的病养好之后，他又回到Merck去上班了，直至又一次得更严重的病才退下来。

今年春天，我太太在上海遇到老覃与他太太在淮海路上逛马路，并且去挤公交车。我太太回来对我说，老覃现在情况不错。一个月之前，与老覃阔别四十多年的同学张宪申专程从St .Louis飞过来探望老覃。我和我太太也一起赶过去看望老覃。老覃那时虽然躺在病床上，人也比以前消瘦了，但是精神非常好，与我们健谈得很。所以，张宪申已经40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一见面就说，似乎又见到了中学时代的老覃，一点没变。当时老覃笑着对我们讲了最近几次他的病情起伏的详情。他很自信地说：“还能拖，还能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10月3日下午与他太太通的一个电话中，噩耗传来：“老覃走了！”正如老覃自幼的好友加同学徐立峰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中说的：“一个科学家走了！一颗明星陨落了！”

我们谨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和维持网站，开展活动，支助校友，回馈母校。

希望每位收到《钟声》的校友不要忘了今年的会费。

校友会会费为每年\$10.00，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支票请寄：**Youcheng Wu or Qiuyi Ye, 1 Hayes Ct, Stony Point, NY 10980, USA**

Online Payment: **JP Morgan Chase Bank,  
P.O.Box 659751, San Antonio, TX 78265 A/C # 00000822115721**



Dear Zhong Sheng staff members:

Salute to all of you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17 issues of Zhong Sheng. What a successful publication!

I, as a former teacher of Weiyu Middle School, really enjoy reading every issue of Zhong Sheng. It always revives my memories of many colleagues working together for 19 years, hundreds of students (teenagers then and around sixties now), and unforgettable campus. I just couldn't wait for the next issue.

All this won't be possible if not for your perseverance of hard-working, and your contribution of time, energy and talent.

Thank you all agai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ies.

Sincerely,

Pauline Yang (杨宝琳老师)

Holly和各位校友:

新的一期钟声收到, 非常感谢。附上支票交会费。

我是1957-1960年位育初中就读, 我们在沪同学已找到近三十位, 每年都聚会。我86年来美, 90年因工作, 搬至Denver Colorado, 一住就20年了。

看来, 大家都开始谈退休的打算了, Ms. 徐知道我的业余Hobby就是自学钢琴。打60岁开始, 已自学了4~5年了。我另一愿望就是驾车周游美国和中国。

我们曾尝试跟大巴旅游, 结果二周花\$5000元, 路上被导游, 司机骗, 吃不好, 睡不好, 到处蜻蜓点水, 玩得也不舒畅, 总之劳命伤财。

我曾想建立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的Bed & Breakfast 网站, 但总觉得陌生的同胞住进家里, Security problem 不能保证。但在校友会内成立, 此问题就变得不太Worry了。这次我看到明州的学长非常慷慨地邀请大家, 我很感动 (特别是他的Generosity)。因此, 我想出一个Project, 想与各位商量。

1. 各位校友都成空巢家庭 (小孩已出道)
2. 都有作休闲旅游的计划, 又分散在美国各州。
3. 同出一校, 互视为兄弟姐妹, 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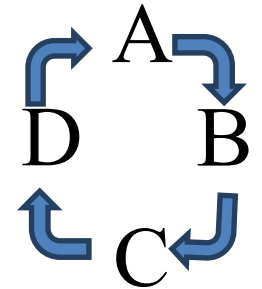
是否能`4-6个家庭组成一“康乐泳”会: 即

A家庭到住到B家里三月, 并以B家为据点, 玩遍B所在州, B, C, D以此类推。

象少儿时我们玩打康乐球一般, 或称此计划为求康乐或“康乐求”计划。这样, 四个家庭每年玩遍四个州, 费用最少最休闲。

当然, 这只是个初构想法, 将得到大家响应后, 再可修缮妥当。

再次感谢各位校友的辛苦, 将北美校友会办得如此生气盎然。



陆缙聪 60届

德霖学弟,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和邀请, 我们老弟兄仁都很欣赏你的文章, 只可惜没有机会见面。

在北美, 文革前毕业的位育学友所剩无几, 见面机会甚少, 也只能通过《钟声》来了解母校与北美校友们的情况了。非常感谢你和全体编委们的辛勤工作, 为身在异国他乡的位育校友们提供了一份丰盛的精神食粮。祝母校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祝所有的校友们健康平安。

周国辉 59届

# 愿我们常相聚



2011年3月7日部分美东校友聚会于新泽西州郑晓群同学宅邸



2011年8月27日部分美东校友聚会于马里兰州周嘉瑜同学宅邸



2011年6月19日部分美东校友聚会于纽约

2012年春节部分美东校友和老师聚会于纽约





《1911武昌起义——会师中和门》，油画，2米x4米，2011，汤沐黎画

## 辛亥风云人物画采

《1911武昌起义——会师中和门》创作手记

汤沐黎  
66届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领导机关被破坏，群龙无首的险境中，冒死起义。一百年之后，我创作了一幅2米高4米长的大油画，力图再现这起最终推翻清王朝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事件是许多场面的总和：起义者首先在城内外各营房发难，接着抢占军械库，会师中和门，攻占总督衙门，稍后还进行了阳夏保卫战。过去有关这个题材的美术作品，包括历史博物馆所藏油画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浮雕，都局限于描写步兵攻占总督衙门的场面。而这次我选择的，是马、步、炮三军会师中和门的场面。因为在仔细研究了史料后，我意识到炮兵的决定性作用被以往的美术作品忽略了。在当夜攻打总督衙门的激烈战斗中，人数并不占优势的革命军步兵起先完全被总督卫队的重机枪火力压倒，最后靠拉上蛇山的炮兵持续猛轰，才摧毁了衙门，逼走了总督，占领了全城。总督衙门失守，清方所缺正是火炮，可以说当夜谁掌握了炮兵，谁就胜券在握。然而今人皆知指挥开第一枪的步兵班长熊秉坤，给他“熊一枪”的尊称，却鲜知还有个开第一炮的蔡汉卿，他恰好是台湾歌星蔡琴的爷爷。我决定自己的构图必须恢复炮兵应有的地位。而马、步、炮三军同时在画面上出现的场面，仅在会师中和门时才有。正是在这里，三军取得楚望台军械库弹药补给，会师又分手，步兵冲向总督衙门，炮兵布阵蛇山，骑兵通讯联络。

根据史实，抢占中和门时没有发生战斗，因而我的画面上没有出现敌人，也无高级军官，只有士兵和班排连长。一位穿长靴握军刀的连长吴兆麟式的人物被安排在右边角落，因为他并不是起义的策划者和发动者，而是同情者，事发后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画面中心是广大普通士兵程定国和金兆龙之辈，他们才是最早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高举的步枪，明示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黑红色九角十八星旗代表着革命铁血之魂和关内九州十八省联合反清的决心。事实上此旗是翌日清晨起义成功后才挂出来的，但没有了它，这群人物的身份、目的和时代性都变得模糊不清，它已经成为画中不可缺少之精神象征。原来的中和门城楼已毁，新建的城楼有洞无门。我笔下塑造的斑驳的七钉朱门既彰显着省府之权威，也隐喻着王朝的没落。任何历史画创作都会遇到学术问题，此画亦不例外。譬如说军人们是否留有辮子？几经周折才查到起义半年前湖北新军当局的告示，明令士兵剪辮束髻藏匿帽中，但连以上军官仍须留辮。又譬如说士兵们穿的是布鞋、皮鞋还是毡靴？旧照片模糊不清。当事人回忆录中却有穿不惯日本式军用品鞋出操的语句。炮型如何，枪型如何，领章帽徽如何，凡此种种，造成多次改稿的局面。

在构图上，我刻意追求动荡感和瞬间感，一切能动的因素都让它动起来：人体、马匹、枪炮、烟火、光影——单独看，它们各自处于失去平衡的斜势，互抵以后，总体达到大平衡。画布选纹理最粗的，采用棕红浓烈色调，以适应革命主题和夜景。运笔顺应动势，风格上保留一些轮廓线，暗通国画传统，避免画风“太洋”的感觉。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没有机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而是内争外侵，长期动荡，几乎亡国。直至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终于又繁荣富强了，繁荣富强到后人有余力用油画的形式来答谢前人的献身了，正是：

一炮撼中华，百年流血霞。有毫酬壮士，无语对黄花。